

# 亚太地区概述

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亚太地区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这是首个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地区，中国武汉市于 2019 年 12 月报告了首起新冠病例。当中国当局训诫对这一新病毒发出警报的卫生工作者时，引发了中国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人民呼吁各国提高透明度。在这一年中，各国政府多次以疫情为借口压制异见，并对包括接受和传播有关新冠信息的权利在内的言论自由权施加不当限制。

亚太区内多个国家的政府制定了法律和措施，对传播新冠“错误信息”或“虚假信息”的行为加以惩罚。在当局经常滥用权力的国家，这些法律被用来加大现有的镇压力度，特别是对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公开辩论和批评政府应对疫情受到严格限制。在亚太地区，众多人权捍卫者、记者、律师和政治反对派成员因为合法表达异见及批评政府，而受到各国政府攻击，包括骚扰、恐吓、威胁、暴力行为和任意拘捕。

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和其他行动限制。当局往往不允许公共集会，这大大限制了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过去一年，印度、泰国和香港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府压迫。警方诉诸过度和不必要的武力驱散这些公众集会。

多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应对新冠疫情，通过了压制性的国家安全法或反恐法，或将其武器化。这些法律巩固了亚太地区一些政府已在行使的权力。在印度，发表和平异见的人受到惩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通信及关键自由继续受到限制；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因涉嫌从事“反国家”的活动受到查问。

虽然亚太地区的死亡人数较之于世界其他地区要少，但疫情对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加深了原有的社会裂痕。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如移徙工人、难民、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以及被监禁者。

多国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蔓延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反映了现有的歧视妇女的父权规范。封锁措施也让妇女和女童受到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数量急剧增加，但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并未提供足够的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

该地区的宗教及民族少数群体受到攻击。中国当局继续对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进行系统性的镇压。在疫情期间，印度的穆斯林遭到攻击，被妖魔化，并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缅甸军方继续逃避针对罗兴亚人所犯罪行的责任。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民族成员被武装组织杀害。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席卷了亚太地区。该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例较高的国家没有制定适当的减排目标，以避免气候变化对人权造成最恶劣的影响。

## 言论自由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消息传出后的几天内，该地区数个国家的当局试图压制有关信息，并惩罚了那些批评政府行动的人。中国当局试图在线上和线下控制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数百个与该病毒有关的关键词被屏蔽，要求实现获取和传播新冠相关信息权利的网上抗议活动被删除。李文亮医生是在政府披露疫情前试图传播新病毒相关信息的 8 人之一，他在通知同事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以避免感染后遭到警方的训诫，后来死于新冠病毒。

亚太地区的其他几个国家经常以打击虚假或不准确的信息为名，施加类似的限制，约束人们可以或不可以谈论的新冠相关内容。4 月，印尼当局下令警方搜索互联网，打击“骗局传播者”和侮辱政府的人。至少有 57 人被拘捕。记者、学者、学生和活动人士在网上受到恐吓，包括通过短信发出的身体暴力威胁。在印度和尼泊尔，当局以涉嫌传播有关疫情的“错误信息”或“假新闻”，拘捕或起诉了数十人，当中有许多人是记者。

在严苛的法律下，许多批评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人（包括记者在内）都受到了惩罚。在斯里兰卡，警方警告称，将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批评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人采取法律行动。在该声明发布后，多名社交媒体评论员被拘捕。在孟加拉国，近一千人被控违反了该国的《数字安全法》，353 人被拘押。首批受到打压的目标是记者穆希乌丁·萨卡尔（Mohiuddin Sarker）和图菲克·印布洛斯·哈立迪（Toufiq Imroz Khalidi），二人均是门户网站的编辑。当局于 4 月拘捕了他们，原因是他们在报道中指出，指定用于新冠疫情救济工作的资金方面存在腐败问题。在巴基斯坦，当局一再援引《电子犯罪法》，指控或拘捕在网上发表批评意见的记者，指控和拘捕行动还常常伴随着恶毒和有组织的网络攻击。

记者继续因报道政府不喜欢的新闻而面临报复。在缅甸，在少数民族武装反对派团体“若开军”（Arakan Army）被定性为“恐怖组织”后，至少有 3 名记者因与该团体联系而被根据反恐法和《非法结社法》起诉。在查谟和克什米尔，18 名记者因进行报道而被印度警方袭击或传唤。在《克什米尔时报》编辑起诉政府切断该地区的互联网和电话服务后，该报办公室被封。在尼泊尔，政府制定了几项新的法案，对网上和线下的言论自由权构成了威胁。在新加坡，当局在法庭上受到挑战，但仍全年利用《防止网络虚假和操纵法案》来压制政府批评者和独立媒体的言论。在菲律宾，记者玛丽亚·瑞萨（Maria Ressa）和雷纳尔多·桑托斯（Reynaldo Santos）被判犯有“网络诽谤罪”，立法者拒绝对该国最大的独立广播网络之一 ABS-CBN 延续特许经营权。

**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言论自由权尤为重要，当中包括接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各国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针对新冠疫情获得可信、客观和基于证据的信息可以拯救生命。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记者和媒体可以在提供可靠信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它们能扮演重要角色，唤起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维护人权。各国政府不应阻挠这些努力，而是允许、促进和保护该地区有活力而独立的媒体。**

## 人权捍卫者

记者、律师和政治反对派成员等人权捍卫者因合法地支持人权、表达异议及批评政府和腐败的行为，而继续受到攻击、骚扰、恐吓、威胁和杀害。

在中国，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受到骚扰、恐吓、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虐待，并被任意和与外界隔绝地羁押。他们还常常被指控犯有“泄露国家秘密”等措辞含糊的罪行。他们经常遭秘密审判，被剥夺了获得律师代理的权利。代理这些人权捍卫者的许多律师被剥夺了行动自由的权利，无法会见他们的当事人及查阅案件材料。

在这一年里，该地区许多国家的政府试图破坏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以阻止人权捍卫者继续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柬埔寨当局利用镇压性的《结社和非政府组织法》，将揭露造成环境恶化的人权捍卫者定为非法团体。9 月，在印度当局冻结了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分会的银行账户后，该组织被迫停止了运营。在这一年里，该组织发布了关于 2 月德里骚乱期间和之后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骚乱造成 53 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并有 500 多人受伤。骚乱发生前，政府官员和议员发表了煽动性讲话，但其在数月后都未得到有效调查，包括有文件证明德里警方共谋并参与了骚乱。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分会还发布了一份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报告，记录了该地区在 2019 年 8 月被取消特殊地位后发生的侵权行为。

在马来西亚和阿富汗，呼吁关注政府当局腐败行为的人权捍卫者在这一年中面临严峻挑战。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enter to Combat Corruption and Cronyism）的仙蒂娅·加布里埃尔（Cynthia Gabriel）以及范平东（Thomas Fann）和任斯文（Sevan Doraisamy）等人权捍卫者因指出与公职人员有关的腐败丑闻而被马来西亚当局调查。对阿富汗赫尔曼德省（Helmand province）官员提出腐败指控的人权捍卫者因受到政府官员的攻击而受伤住院。此外，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记者和温和的宗教当局受到武装团体的针对性攻击和暗杀。

在菲律宾和印度等国，政府以反恐措施对付人权捍卫者，或给他们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菲律宾当局继续把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加上红色标签”（red-tagging），称其为“恐怖分子”或武装共产主义团体的支持者。8月，兰德尔·阿卡尼斯（Randall Echanis）和扎拉·阿尔瓦雷斯（Zara Alvarez）一周内在不同的城市相继被杀。二人均因自身的行动和人权工作而被政府“标记”为“恐怖分子”。在这一年里，印度的主要反恐机构国家调查局（National Investigation Agency）拘捕了多名人权捍卫者，并搜查了他们的住所和办公室。被捕者中有7名与边缘化群体合作的人权捍卫者，以及9名对歧视性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提出和平抗议的学生。国家调查局还突袭搜查了克什米尔人权捍卫者胡拉姆·帕维兹（Khurram Parvez）及其3名合作者的办公室和住所。

随着阿富汗冲突进入第20个年头，人权捍卫者据信被属于武装组织的身份不明枪手打伤或杀害，这当中包括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Afgh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两名工作人员，二人在喀布尔的一次汽车袭击中丧生。12月，加尼（Ghani）总统设立了一个保护人权捍卫者的联合委员会，此举被人权组织视为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这似乎是该地区在承诺解决系统性侵犯人权捍卫者的问题方面的唯一发展。

在斯里兰卡，新政府继续镇压包括活动人士、记者、执法人员和律师在内的人权捍卫者。

**各国政府必须有效处理各种针对人权捍卫者的暴力行为，这些行为的施害者必须被追究责任。至关重要，人权捍卫者能够在无需惧怕惩罚、报复或恐吓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使人人都能有效地享有所有人权。**

## 健康权

新冠疫情凸显并加剧了该地区民众在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方面的差距和业已存在的社会差距。在朝鲜，由于缺乏医疗用品，促使新兴中产阶级在所谓的“灰市”上获取药品或医疗服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贫困率和其他慢性病令新冠感染者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柬埔寨和菲律宾继续开展将吸毒者入罪并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任意拘押吸毒者的禁毒运动，导致监狱人满为患，被拘押者的健康权继续受侵犯。在菲律宾，最高法院下令释放8万多名囚犯，以防止新冠病毒在监狱中蔓延。在柬埔寨，当局公布了缓解监狱拥挤问题的计划，但其执行力度有限。

在马来西亚，当局在移徙工人较多的地区进行突击检查，拘捕和拘押了许多移民和难民。多家移民拘押中心爆发新冠疫情，逾600人被感染。

**政府必须确保人们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享用卫生设施和服务。**

## 歧视——对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攻击

在整个亚太地区，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继续遭受当局的歧视、暴力及其他形式的迫害。

1 月，国际法院下令缅甸政府阻止对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缅甸当局没有确保对 2017 年若开邦的军事行动实施问责，是次行动导致 70 余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安全部队继续在反叛乱行动中，对若开邦、钦邦、克钦邦和掸邦的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实施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在中国，当局以打击“分裂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由，为歧视和迫害藏人以及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行为辩解。中国当局继续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任意拘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并对他们进行进行政治教化和强制文化同化。在这一年里，中国政府加强了进入新疆的限制，并继续建立大规模拘禁营。

失踪 3 年的依明江·赛都力 (Iminjan Seydin) 于 5 月现身，在一份明显是胁迫作出的证词中赞扬了中国当局。维吾尔人玛依拉·亚库甫 (Mahira Yakub) 在保险公司工作，因为给身在澳大利亚的父母寄钱帮助其买房而被控“资助恐怖活动罪”。自 2018 年 3 月起被拘押的哈萨克作家那合孜·木哈买提 (Nagyzy Muhammed) 因在十年前左右的哈萨克斯坦独立日与朋友共进晚餐而被当局以“分裂国家罪”秘密定罪。

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亦面临压力。中国大使馆及代表机构继续骚扰和恐吓那些已离开中国并流亡海外的人。中国的国安人员利用即时通讯软件骚扰海外的维吾尔人，要求他们提供身份证号码、居住地点及其他详细信息。一些人接到国安的电话，要求他们监视散居在外的维吾尔社区。

在内蒙古，新的双语教学政策将一些班级的教学语言从蒙古语改为汉语，引发了民众的抗议。据报道，数百名抗议的学生、家长、教师、孕妇及儿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而被捕。在抗议活动中发声的维权律师胡宝龙据称被当局以“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拘捕。

在一些国家，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而印度的穆斯林是被进一步边缘化的群体之一。在穆斯林团体塔比利吉贾马特 (Tablighi Jamaat) 被指控在一次公众集会上传播病毒后，许多穆斯林被拒绝提供医疗服务和基本商品。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呼吁抵制穆斯林企业。在斯里兰卡，当局阻止穆斯林按照宗教仪式埋葬死于新冠的人，并强行将尸体火化。据报道，斯里兰卡政府将该国的穆斯林社区列为疫情的高风险来源，对其进行种族划分。

在阿富汗，自称“伊斯兰国”的武装组织袭击了该国为数不多的锡克教寺庙之一，造成至少 25 人死亡。该国以什叶派为主的哈扎拉 (Hazara) 社区也多次遭受武装组织的袭击，包括去年 10 月喀布尔一所学校发生爆炸，造成 30 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在巴基斯坦，艾哈迈迪耶 (Ahmadiyya) 社区遭受了袭击、社会和经济抵制，并发生了至少 5 次有针对性的杀戮事件。在穆斯林圣月穆哈兰姆月 (Muharram) 期间，仇恨的传教士煽动针对该国什叶派少数民族的暴力行为，对什叶派神职人员提起了近 40 起亵渎神明的诉讼。7 月，巴基斯坦当局屈服于政客、一些媒体和神职人员的压力，停止了在首都伊斯兰堡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的工程，此举剥夺了该社区的宗教和信仰自由权。巴基斯坦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强迫印度教和基督教妇女及女孩皈依伊斯兰教的行为。

**政府必须确保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人权得到保护。此外，当局必须促进所有少数群体平等地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并采取措施结束针对他们的系统性歧视。**

## 妇女和女童

新冠疫情凸显并加剧了亚太地区现有的男女不平等问题。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反映了轻视妇女的重男轻女标准和性别刻板印象。

在女性的工资通常低于男性的非正规行业，成千上万的妇女突然失去了生计，被迫在家中承担更多的照顾责任，如在家教育孩子或照顾生病的亲属。在过去几年里，亚太地区的女性在家中承担的无偿工作量是男性的 4 倍多。有关数字在疫情期间急剧上升。

疫情期间，妇女也占必要工种工作人员的大多数，当中包括医生、护士、环卫工人和其他工种。在巴基斯坦，5 月爆发了针对卫生工作人员的暴力事件，一群女卫生工作者被迫将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自保，因为不满的病人家属破坏了她们工作的医院。

海湾地区的移徙家政工人大多来自亚太地区，在疫情开始时失去了工作，被迫回国。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财政刺激方案并没有为这些妇女作出特别规定，诸如社会保障等，以照顾她们的需要。

在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政府没有将为妇女提供的服务归类为基本且在封锁期间可以继续提供的服务，包括那些旨在支持或协助遭受性暴力或性别暴力的妇女的服务。与施暴伴侣或家庭成员同住的妇女和女童有进一步遭受暴力的风险。在整个亚太地区，家庭暴力和亲密伴侣实施暴力的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在日本，仅 4 月份就接获了 1.3 万起案例，比 2019 年同期增加了 29%。

妇女继续遭受厌女者的恶意攻击。在印度尼西亚，数字攻击的目标包括女权主义新闻媒体。一名记者的账户被黑客攻击，并受到攻击者的骚扰，给她发送色情图片和贬低女性的言论。在韩国，随着数字性犯罪的作案者被拘捕，针对妇女和女童的网络暴力变得越发明显，无所不在。作案者敲诈了 70 余名妇女和女童，让她们分享性剥削的视频和照片，然后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传播这些视频和照片。

在柬埔寨，洪森（Hun Sen）首相带头公开攻击妇女的言论自由权，以“传统”和“文化”等武断概念作为管制女性身体和选择的正当理由。1 月，他下令警方对脸书（Facebook）上据称穿着“暴露”衣服宣传产品的妇女采取行动。没过几天，一名脸书上的卖家就被拘捕，并被指控为她所穿的衣服制作“色情作品”。6 月，柬埔寨对妇女权利的攻击加剧。政府试图将处罚变成法律，将穿着“太短”或“太透”衣服的行为定为犯罪。该法律草案在网上引发了众多妇女和女童的抗议。

在多个国家，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和针对这些罪行的有罪不罚现象持续存在。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施行巫术的指控使妇女面临更大的暴力风险。在阿富汗，妇女继续受到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特别是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如果妇女被认为违反了武装团体对伊斯兰法的解释，就会受到暴力“惩罚”。这一年内，阿富汗报告了 100 多起与暴力对待妇女有关的谋杀案。这些谋杀案显示了政府始终没有对有关的谋杀案进行调查，也未有效解决妇女遭暴力对待的问题。在斐济，一名因犯有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 8 年的前橄榄球队长在服刑不到一年后获准恢复训练。

在巴基斯坦，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游行不断受到攻击，首先是法院试图禁止游行，然后一个宗教团体于游行当天在伊斯兰堡用石块攻击游行示威者。不过，警察没有保护抗议者。9 月，一名女子在一条国家高速公路上被轮奸，事件引燃全国的怒火，人们要求省最高级警官辞职并对强奸犯施以更严厉的惩罚。12 月，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旨在加快强奸案的审判过程，并以强制化学阉割的方式惩罚犯罪者。国际特赦组织担心，若采取强制化学阉割方式，巴基斯坦会违反有关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国际义务和宪法义务。

在印度和尼泊尔，达利特（Dalit）妇女被强奸的事件引发了愤怒。5 月，在尼泊尔的鲁潘德希（Rupandehi）地区，一名 12 岁的达利特女孩被迫嫁给了据称强奸她的、占统治地位种姓的男子。9 月，另一名 12 岁的达利特女孩在巴章区（Bajhang district）被奸杀，涉嫌强奸她的男子在一个月前另一名 14 岁女孩的强奸案中避过起诉。同样在 9 月，一名达利特妇女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哈特勒斯（Hathras）被一群占统治地位种姓的男子强奸并杀害，她

的尸体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被警方火化。在全国爆发要求伸张正义和究责的抗议活动后，被告才被拘捕。

韩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意在解决与暴力侵害妇女相关的问题。政府通过了法律，加强保护妇女和女孩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国民议会加大了对网络性犯罪的惩罚力度。当局将同意性交的年龄一视同仁地从 13 岁提高到 16 岁，并取消了性剥削儿童案的诉讼时效。

**各国政府在制定疫情后的应对和复苏措施时，必须优先考虑促进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暴力和有害的性别刻板印象。在制定疫情后的应对和复苏计划时，各国政府必须让妇女参与立法、政策和预算决策进程的所有阶段。**

## 没有防止气候变化

亚太地区尤其受到气候危机的影响。2020 年，一系列气候冲击影响了该地区民众的人权。超强台风安攀（Amphan）重创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缅甸遭受大面积洪灾，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澳大利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森林大火，造成居民流离失所和空气污染。

尽管气候危机的影响十分严重，亚太地区对全球排放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却没有制定适当的减排目标，以避免气候变化对人权造成最严重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国，澳大利亚并未就 2030 年制定更进取的减排目标，也未承诺在长远实现净零排放。尽管日本和韩国宣布了 2050 年的碳中和目标，中国宣布了 2060 年的碳中和目标，但三国没有证明为了在这一日期之前实现零碳排放而正在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以避免对国内外人民的人权造成重大损害。

**各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和实施减排目标和战略，保护人权不受气候危机的影响，并确保在公正且符合人权的情况下过渡到零碳经济和构建更有活力的社会。**

#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元首：习近平

政府首长：李克强

今年，人权捍卫者及被认为持不同政见者被严厉打压，少数民族也遭到有系统地镇压。今年年初，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4,600 多人死亡。就该病毒发出警告的卫生专业人员被当局训诫后，人们要求言论自由和透明度。在联合国，中国政府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并被敦促立即、切实的允许联合国人员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有增无减。外国记者受到拘押和驱逐，其签证续签亦遭到系统的拖延或被拒绝签。中国和其他在中国境外营运的科技公司屏蔽被政府视为政治敏感内容，将其审查标准扩展到国际领域。中国颁布了首项《民法典》，而在草案征求意见期间更收到了数千份公众呼吁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意见书。香港《国家安全法》导致了言论自由受到压制。

## 人权捍卫者

中国政府枉顾宪法规定及其国际承诺和义务，继续不断对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进行迫害。在这一年里，他们受到了系统性的骚扰、恐吓、强迫失踪、任意关押、禁止与外界接触的羈押，以及长期监禁。司法不独立及缺乏有效的公正审判保障加剧了一再发生的侵害行为。许多人权律师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权，也被剥夺了会见和代理被告以及查阅案件材料的权利。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成为打压的目标，并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及“寻衅滋事罪”等定义宽泛、措辞含糊的罪名。

数十名知名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于 2019 年 12 月在福建省厦门市参加了一场私人聚会后一直被任意羈押。3 月 23 日，联合国人权专家对前人权律师丁家喜和其他人权捍卫者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他们指出，这些人遭到了强迫失踪。法律学者许志永和丁家喜被禁止与外界接触羈押了 6 个月后，在 6 月 19 日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并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不能联系家人和他们选择的律师。<sup>1,2</sup> 2 月 24 日，香港书商桂敏海被秘密审理后，因“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sup>3</sup> 反歧视活动人士程渊、刘永泽、吴葛健雄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被羈押一年多后，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期间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受审。这三人仅仅因为倡导边缘群体和陷入危险者的权利而被任意羈押。

9 月 17 日，四川人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始人兼负责人黄琦终于获准与母亲通话，这是他自 4 年多前被拘押以来的第一次。据报，黄琦的健康状况自 2019 年 1 月被判入狱 12 年以来持续恶化，而且似乎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症状。被控间谍罪的澳大利亚作家、博客作者杨恒均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起被与外界隔绝地关押，其后终于在 8 月 31 日得以会见澳大利亚领事代表及其律师。据报，他接受了 300 多次讯问，并继续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

2015 年，中国政府对人权活动人士和人权律师实施史无前例的镇压，被称为“709 镇压”。事件发生 5 年后，许多律师仍在狱中或受到严密监视。6 月 17 日，被与外界隔绝羈押 18 个月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受到秘密审判，并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sup>4</sup> 据其律师表示，余文生在羈押期间遭受酷刑，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人权律师江天勇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囚，在服刑两年后于 2019 年获释，并与他的父母继续受到严密监视。人权律师王全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在服刑 4 年多后于 4 月 4 日出狱，并于 4 月底与家人团聚。据其律师表示，王全璋曾遭受酷刑。

## 自治区：新疆、西藏和内蒙古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和西藏自治区（西藏），以“反分裂”、“反极端”、“反恐”为名对少数民族实施的大规模严厉镇压有增无减。进出西藏仍然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对记者、学者和人权组织而言，导致调查和记录该地区的人权状况困难重重。在新疆，自 2017 年以来，估计有 100 万或以上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任意拘押，并在“教育转化中心”内接受政治教化和强制的文化同化。由于缺乏可公开获得的数据和进入该地区受到的限制，目前仍然无法记录侵犯人权行为的全貌。当局最初否认拘禁营的存在，但后来却称其为“职业培训中心”。然而，卫星图像显示，在这一年中，当局继续修建了更多的拘禁营。

从 2017 年起便不知所踪的维吾尔知名历史学家兼出版商依明江·赛都力（Iminjan Seydin）突然再次出现，并于 5 月初在一家官方英文报纸发布的视频中赞扬中国政府。他在视频中的言论似乎经过编排，意在抹黑他女儿关于他被任意羁押的公开证词。维吾尔企业家、慈善家艾克拜尔·艾赛提（Ekpar Asat）在 2016 年参加完美国国务院的领导能力培训项目返回新疆后失踪。1 月，他的姐姐发现，艾赛提因“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被秘密定罪，并被判入狱 15 年。维吾尔模特麦尔丹·阿巴（Mardan Ghappar）自 1 月起被拘押，从 3 月起无人见过他或听过他的消息，当时他描述自己被拘押在恶劣环境中的信息和图像被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上。1 月，在保险公司工作的维吾尔人玛依拉·亚库甫（Mahira Yakub）因汇款给在澳大利亚的父母而被控“资助恐怖活动罪”。据她妹妹说，这笔钱是 2013 年转给她的父母买房子。9 月，自 2018 年起被拘押的哈萨克作家那合孜·木哈买提（Nagyз Muhammed）被当局以“分裂主义罪”判处无期徒刑，而这与他在 10 年前左右的哈萨克斯坦独立日与朋友共进晚餐有关。

越来越多旅居海外的维吾尔人要求当局出示证据，证明他们在新疆失踪的亲人还活着。据报道，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被中国驻其居住国的外交机构告知，他们只有回到新疆才能更新中国护照。中国大使馆和代表机构骚扰和恐吓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及其他离散少数民族社群成员。<sup>5</sup> 为了让旅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噤声和压制他们的活动，新疆地方当局据报将目标锁定他们在当地的亲人。中国国安人员通过即时通讯应用程序联系许多旅居海外的维吾尔人，要求他们提供身份证号码、居住地、护照照片和配偶的身份证信息等资料。另一些人据报多次接到国安的电话，要求他们收集海外维吾尔社区的信息并监视他们。

6 月，50 名独立的联合国人权专家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和西藏等地镇压宗教少数群体及少数民族的行为。10 月 6 日，39 个联合国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对新疆、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人权状况提出严重关切，敦促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相关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等独立观察员立即、切实且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中国政府利用其不断上升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以及在联合国内不断扩张的角色，继续寻求方法来挑战既定的人权机制。<sup>6</sup>

在内蒙古，新的“双语教学政策”引发了区域性抗议。该政策将在 9 年义务教育期间逐步将几个班级的教学语言从蒙古语改为汉语普通话。据媒体报道，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孕妇和儿童在内的数百人因“寻衅滋事罪”被捕，原因仅仅是他们参加了和平的抗议活动或在互联网上分享有关抗议活动的信息。据报道，人权律师胡宝龙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而被正式逮捕。

## 健康权

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的最初几周，政府的审查制度阻碍了重要信息的流动。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专业记者、公民记者及医疗工作者均被阻止报道疫情。地方当局后来承认其隐瞒了信息，令公众无法及时获取有关病毒的必要信息。据公安部消息，截至 2 月 21 日，针对新冠疫情“编造及故意传播有害虚假信息”的刑事调查案件数目已经超过 5,511 起。虽然医护人员在 2019 年 12 月下旬已经就病毒提出了警告，政府却没有及时做出回应，且对那些发声之人实施打压，因而延误了协调应对措施。<sup>7</sup>

当局以公共卫生和安全的名义广泛实施的个人和技术监控，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sup>8</sup> 当局为实行强制封城措施而推行“网格管理制度”。在此制度下，各省级政府均指派了数十万社区工作者监视其所在的社区。许多无法出示相关证件或近期出城的居民不能回到自己家中。4月，广州等地的非洲裔居民因新冠疫情遭受歧视，被赶出自己的家门和居住的酒店，并被禁止进入餐馆。

## 言论自由

由于要压制与新冠疫情和极端的封锁措施相关的信息，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继续。在疫情震中武汉，医务人员和活动人士因“发表不实言论”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而受到当局的骚扰。李文亮医生是试图在疫情尚未公布前敲响警钟的8名人士之一。他在聊天群中发出警告信息，让医生同行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以避免受感染，却在4天后被当地警方训诫，随后死于新冠肺炎。全国各地的民众因他的死而在互联网上表示愤怒和悲痛，并要求言论自由和废除审查制度。当局在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应用程序上屏蔽了数百个关键词组合。发表在网上的异议、疫情相关的敏感标签以及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被迅速删除。外泄的通知显示，当局下令被指“散布谣言”的人删除其社交媒体账号和帖子。

当局拘押或惩罚那些披露新冠疫情细节的人。据报道，许多记者和活动人士仅仅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便受到骚扰及被长期与外界隔绝地羁押。4月19日，人权捍卫者陈玫和另外两位端点星众筹项目的参与者仅仅因为收集和归档有关疫情的公共信息，就被北京警方拘押，与家人失去联系。敢言律师兼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武汉居民方斌在报道了疫情并上传了武汉医院内部拍摄的视频后于2月初失踪。他们仍然下落不明。12月28日，公民记者张展因报道武汉的新冠疫情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据报，双手被24小时束缚超过3个月的张展受到酷刑对待，并在开始绝食后被强行喂食。

在这一年里，一些外国记者被驱逐出境，另一些则在续签时受拖延及被拒签。中国外交部吊销了多个美国媒体的美国记者的资格证，并将他们驱逐出境。8月，澳大利亚记者成蕾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另有两名澳大利亚记者起初被拒绝出境并被安全官员讯问，之后离开了中国。

4月，当局对有关追查新冠病毒来源的学术论文施加了新的严格限制，要求此类论文必须提交国务院任命的工作小组审批。7月13日，发文批评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法学教授许章润被拘6天后获释。据报，他在获释的次日就被清华大学开除。8月19日，北京大学公布了一系列关于参加外国及港澳机构举办的网络研讨会和会议的新规定。该通告要求参加者在活动开始前15天提出申请并寻求批准。

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审查和监视延伸到了境外。在中国境外经营的中国科技公司依照国内严格的审查标准对被认为“政治敏感”的内容进行封锁和审查，当中包括有关少数民族、政治动荡以及批评中国政府的话题。6月12日，电话会议公司Zoom透露，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该公司已经暂停了中国境外人权活动人士的账户，并表示其将屏蔽任何政府认为“非法”的会议。<sup>9</sup> 视频分享软件抖音删除了大量旅居海外的维吾尔人为引起人们关注其失踪亲人而发布的视频。外泄的内部文件显示，该平台曾指示版主审查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视频，诸如法轮功或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

## 宗教和信仰自由

自2月1日起生效的条例规定，宗教团体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府试图使宗教教义和习俗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并对国家批准的和未注册的宗教团体全面加强控制。有报道记录了数以千计的文化和宗教遗址被破坏的情况，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在新疆和西藏，政府对宗教的压制依然严厉。在《去极端化条例》下，人们因为从事一般宗教活动而被当局视为“极端主义的迹象”，受到任意拘押。

##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人 (同志)

在同志群体空间日益紧缩的情况下，中国规模最大、举办时间最久的上海骄傲节在 8 月 13 日宣布取消今后所有活动。活动人士因公开发表反对歧视和仇恨同性恋的言论而面临骚扰。包括微博和杂志在内的网络平台屏蔽并删除了同志相关的内容和标签。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越来越大的压力，同志社群的成员继续争取他们的权利。据报道，一名大学生对政府批准的教科书中将同性恋者归为“性心理障碍”提出了正式投诉。尽管中国在 2001 年就不再将“同性恋”归类为精神障碍，但法院在 8 月驳回了诉求。5 月 28 日，全国人大通过了首项《民法典》，该法草案婚姻篇共收到社会各界的相关意见 213,634 条。虽然全国人大的一名发言人承认同性婚姻的呼声很高，但根据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民法典》，同性婚姻仍未合法化。

##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最高立法机关通过了措辞宽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国家安全法》）。香港政府加大了对民主活动人士和反对派领袖的镇压，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干预媒体和教育。在新冠疫情下，看似随意执行的保持人身距离规定进一步限制了和平集会自由权。

## 集会和结社自由

2019 年的抗议活动后，针对和平集会权的压制依然存在。<sup>10</sup> 元旦当日的一场抗议活动刚刚进行了 3 个小时，警方就宣布这场经批准的示威活动“非法”，并要求组织者和数万名大体和平的抗议者在 30 分钟内散去。警方随后开始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和水炮，并拘捕了 287 人，其中包括 3 名人权观察员。

4 月 18 日，当局以违反《公安条例》为由逮捕了 15 名知名民主领袖和活动人士，这条法律常被用来禁止和终止大体和平的抗议活动。他们被控在被捕的 6 个月前组织和参加“未经批准集结”。

在当局为应对新冠疫情而实施人身距离的规定后，和平集会自由权进一步受到限制。3 月，政府颁布了《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禁止 4 人以上的公共集会。该禁令几经修改，在年底时适用于两人以上的集会。

当局随后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了至少 14 次抗议活动，其中包括全面禁止一年一度的天安门六四纪念晚会和“七一”抗议游行，不管两大集会的组织者都承诺会遵守人身距离的规定并向当局提供了有关预防措施的详细计划。这是政府首次禁止这两大年度抗议活动。尽管当局已下禁令，仍有数千人聚集在过去纪念六四的抗议地点，26 名活动人士因参加烛光晚会而被控“未经批准集结”。

截至 12 月 4 日，香港警方已根据公众集会禁令开出至少 7,164 张定额罚单。即便和平抗议者遵守了有关保持人身距离的规定，也经常成为被针对的目标。虽然在《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下，因工作而出席抗议活动的记者可获豁免，但报道抗议活动的记者也被罚款。

2 月，约 9,000 名医院工作者罢工，抗议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上拖延实施边境管制。医院管理局随后要求相关人员解释其“缺勤”的原因并威胁要实施报复，此举向医生发出了不要组织及参与罢工的警告，令人为之心寒。

## 言论自由

国家安全被用作限制言论自由的借口。6 月 30 日，措辞含糊的《国家安全法》在未经任何有意义咨询的情况下通过，并于次日生效。根据其规定，几乎任何行为都可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这项法律赋予了当局对和平活动提出起诉的新依据，对言论自由产生了寒蝉效应。<sup>11</sup> 到该年年底时，当局已逮捕了 34 人，涉及张贴政治口号、在海外成立呼吁香港独立的组织，以及支持

各类政治团体。当局还援引了该法的治外法权条款，向 8 名居住在香港境外的活动人士发出逮捕令。

《苹果日报》为支持民主运动的报刊。8 月 10 日，该报的老板黎智英因“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被捕。警方显然漠视记者享有的特权，突袭了该报的办公室并搜查其文件。在检方就黎智英早前获准保释提出上诉后，他仍被关押。

10 月 6 日，当局以“散播港独思想”为由，取消了一名小学教师的教师注册资格，据说原因是其发给学生的一张作业纸包含“你认为什么是言论自由？”以及“香港独立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

## 同志权利

3 月 4 日，高等法院一审裁定，在海外结婚的同性伴侣可以同样享有申请公共房屋的权利。9 月 18 日，高等法院裁定，已婚同性伴侣在配偶一方死亡而未立遗嘱的情况下，享有平等的取得遗产和继承权。然而，在同一天作出的另一项判决中，法院裁定，拒绝同性伴侣在香港结婚的权利是合宪的。

---

<sup>1</sup> 《中国：知名法律学者被羁押，禁止与外界接触：许志永》（ASA 17/2738/2020）

<sup>2</sup> 《中国：更多信息：律师被控煽动颠覆：丁家喜（ASA 17/2645/2020）

<sup>3</sup> 《中国：被判荒唐 10 年监禁的书商必须被释放》（新闻报道，2 月 25 日）

<sup>4</sup> 《中国：被拘律师余文生之妻讲述持续的抗争之路》（倡导运动，7 月 9 日）

<sup>5</sup> 《中国：无处安身：海外维吾尔人控诉中国政府牵头的打压行动》（研究，2 月）

<sup>6</sup> 《中国：在人权理事会第 43 次会议就项目 10 的一般性辩论期间就项目 10 和关于“互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表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声明》（IOR 40/2563/2020）

<sup>7</sup> 《解释：新冠病毒影响人权的七个方面》（新闻报道，2 月 5 日）

<sup>8</sup> 《中国如何利用科技抗击新冠病毒并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新闻报道，4 月 17 日）

<sup>9</sup> 《中国：Zoom 不应成为政府审查的工具》（新闻报道，6 月 12 日）

<sup>10</sup> 《香港：没有真相，谈何公正》（ASA 17/1868/2020）

<sup>11</sup> 《香港国家安全法：你需要知道的 10 件事》（新闻报道，7 月 17 日）

# 印度

## 印度共和国

国家元首：**拉姆·纳特·考温德** (Ram Nath Kovind)

政府首长：**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言论自由选择性地受到保障，当局通过非法限制和平抗议和钳制批评人士的方式压制异议。包括学生、学者、记者和艺术家在内的人权捍卫者常常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任意拘捕。尽管最高法院裁决减轻监狱人满为患的现象以遏制新冠疫情蔓延，当局却仍继续监禁大量批评政府的人士。当局没有充分调查或惩罚种姓、性和性别暴力行为的施害者，并对报告强奸和种姓犯罪的人进行报复。自发组织的治安团体和警察对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的谋杀和袭击普遍不受惩罚或问责。当局因应疫情迅速对行动自由施加极端的限制，使成千上万的移徙工人在缺乏足够食物和保护的情况下陷于困境。一些遏制疫情的限制措施也对隐私权构成了威胁。

## 背景

2019 年 12 月，政府通过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允许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非正规移民获得印度公民身份，但穆斯林被排除在外。《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歧视性引发了全国性的和平抗议活动，抗议者遭到任意拘捕和羁押，并被普遍妖魔化。

政府遏制新冠的策略包括在通知后很短的时间内实行惩罚性封锁，在分配救济金方面缺乏透明度，威胁隐私，以及妖魔化宗教少数群体。

## 任意拘捕和羁押

7 名人权活动人士因涉嫌在 2018 年参加了普纳 (Pune) 市附近皮马科雷冈 (Bhima Koregaon) 的暴力活动，被印度的主要反恐机构国家调查局 (National Investigation Agency) 拘捕，包括斯坦·斯瓦米神父 (Father Stan Swamy)、乔蒂·拉格宏巴·贾格塔普 (Jyoti Raghoba Jagtap)、萨加尔·塔提亚郎姆·哥基 (Sagar Tatyaram Gorkhe)、拉梅什·梅里达哈·盖克尔 (Ramesh Murlidhar Gaichor)、哈尼·巴布 (Hany Babu)、盖塔姆·纳拉卡 (Gautam Navlakha) 和阿南德·特尔图贝德 (Anand Teltumbde)。这些被捕者与包括阿迪瓦西 (Adivasi) 原住民社区在内的边缘群体合作，并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批评。政府指控他们违反刑法“对国家发动战争”，并与被取缔的印度共产党 (毛派) 有联系。

许多被捕的活动人士都是老年人，身体状况不佳。他们被关押在人满为患的监狱中，当中数名囚犯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或死于新冠。7 月，在 2018 年的皮马科雷冈 (Bhima Koregaon) 案中被捕的 80 岁诗人瓦拉瓦拉·拉奥 (Varavara Rao) 在狱中被检测出新冠阳性。然而，法院继续驳回活动人士的保释请求。

至少有 9 名和平抗议《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学生被当局以反恐和煽动法拘捕入狱。许多其他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抗议者受到警察的强烈恐吓和骚扰。与此同时，当局无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支持者对抗议《非法行为 (预防) 法》(Unlawful Activities (Prevention) Act) 和《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等严苛反恐法律的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和仇恨言论。当时怀孕 3 个月的研究学者萨芙拉·扎加 (Safoora Zargar) 和前学生会领袖乌马尔·哈立德 (Umar Khalid) 都是被捕者之一。前者后来获得保释。

6 月 26 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印度立即释放因抗议《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而被捕的人权捍卫者。但截至年底，大多数人仍被拘押。

12 月，北方邦（Uttar Pradesh）警方根据该邦制定的一项关于双方自愿跨信仰婚姻的法律，任意拘捕了 10 名穆斯林男子，并据称对他们实施了酷刑。这项被右翼民族主义者和主要政界人士称为“爱情圣战”法的立法尚未得到印度议会或邦立法机构的批准。

## 言论和集会自由

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对言论和集会自由施加了新的限制。3 月 24 日，莫迪总理实行全国性封锁，其中包括根据严苛的《灾害管理法》（Disaster Management Act）实施强制“居家”隔离，该法让政府在灾害状态下享有广泛权力。违反封锁相关措施的人会遭到拘捕和羁押。

在疫情还没爆发之前，集会自由就受到了限制，这包括在和平抗议演变为暴力冲突后，要求平民承担公共财产损失。

在政府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并将该邦一分为二的一年后，对公民自由的镇压和对通信服务的限制仍在继续。2019 年被行政拘留的法鲁克·阿卜杜拉（Farooq Abdullah）、奥马尔·阿卜杜拉（Omar Abdullah）和梅博巴·马夫蒂（Mehbooba Mufti）等政治领导人于 2020 年获释。然而，联合政府继续压制那些要求问责的人并对媒体实施了严厉封锁。

在克什米尔，至少有 18 名记者遭到警察的肢体袭击或被传唤到警察局。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出台了一项新的媒体政策，通过审查“反国家活动”的方式，“在媒体上塑造有关政府运作的持续言论”，进一步压制了异议。

10 月 20 日，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关闭了《克什米尔时报》（Kashmir Times）的办公室，原因是该报编辑阿努拉哈·巴辛（Anuradha Bhasin）在最高法院对通讯封锁提出了质疑。国家调查局还突击搜查了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的办公室和住所，这当中包括胡拉姆·帕维兹（Khurram Parvez）和他的 3 名合作者，以及广泛报道克什米尔人权侵犯事件的帕尔维娜·阿汉格（Parveena Ahanger）。国家调查局称，这些活动人士为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实施分离和分裂活动”筹集资金。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全国封锁期间，逾 50 名记者因传播“有误信息”或“假新闻”而被当局依据紧急状态法拘捕或起诉。4 月 7 日，北方邦警方对记者普拉尚特·卡诺加（Prashant Kanojia）提出“第一信息报告”（First Information Report），指控他在社交媒体上对总理莫迪和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发表“令人反感的言论”。不久之后，北方邦警方对每日新闻网站电报网（The Wire）及其编辑西哈斯·瓦拉德拉简（Siddharth Varadarajan）提起了另一份第一信息报告，原因是其报道约吉·阿迪蒂亚纳特在全国封锁宣布后出席了一次公开宗教活动。

9 月 28 日，政府修改了《外国捐款（管理）法》，禁止大型非政府组织将外国捐助者提供的资金转给草根非政府组织。新的修正案还要求所有在《外国捐款（管理）法》下注册的非盈利组织将行政开支限制在捐款的 20% 以内（之前是 50%）。这项修正案或迫使非政府组织削减工作人员，从而可能削弱人权工作。

9 月 30 日，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分会在政府未经通知冻结其银行账户后，被迫停止运营。该组织被迫解雇了所有工作人员，并暂停了所有倡导和研究工作。此事发生前不久，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分会发布简报，要求对德里警方和政府德里骚乱期间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问责。

8 月，3 项关于耕作的法律在没有深入协商的情况下获得议会通过，超过 160 名农民在有关法律通过后死亡，其死因包括自杀，以及抗议期间心脏病发和遭遇道路事故。11 月，在农民朝

德里前进对这 3 项法律进行抗议时，德里警方不加区别地使用水炮，并发射催泪弹，导致抗议者受伤。

## 不公审判

法院未能及时监督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其中以最高法院尤甚。

3 月 13 日，最高法院在还没实行全国封锁之前就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法院将缩减运营。在 3 月 23 日至 7 月 4 日期间，最高法院仅受理“极其紧急”的案件，不进行实地审理，而是依靠视频会议设施。

何谓“极度紧急”的案件并没有任何评定标准或定义，这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许多涉及严重侵犯人权的重大案件得不到审理或被严重拖延。4 月 3 日，在审理一份保释申请时，孟买高等法院坚称“紧急”一词的含义是主观的，例如，其不适用于那些在等待判决结果时申请保释的人。

最高法院常常损害其公正性和独立性。8 月，最高法院以废止了的刑事藐视法律条款判决律师兼人权捍卫者普拉山特·布尚（Prashant Bhushan）有罪。普拉山特·布尚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在推特（Twitter）上批评法院的运作。

## 非法袭击和杀害

2 月，首都新德里爆发了族群暴力。政府数据显示，有 53 人在骚乱中丧生，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另外还有 500 余人受伤。

在筹备 2 月 8 日的德里立法议会选举的过程中，几名政治领袖针对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抗议者发表了仇恨言论。1 月 27 日，联邦财政部长阿努拉格·塔库尔（Anurag Thakur）在提及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平静坐活动的中心沙欣·巴格（Shaheen Bagh）的抗议者时，号召民众“枪毙国家的叛徒”。1 月 28 日，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议员帕尔维什·维尔马（Parvesh Verma）声称，沙欣·巴格的抗议者会进入公民家中，“强奸你们的姐妹和女儿，并将她们杀死”。在同日的另一场演讲中，他承诺印度人民党在德里的选举中获胜后，“连一座[清真寺]也不会有”。

在这些演讲之后，大学校园里发生了针对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抗议者的暴力事件。德里选举后，政治领袖继续发表仇恨言论，随后，德里东北部爆发了广泛的暴力事件。

2 月 23 日，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卡皮尔·米什拉（Kapil Mishra）在推特上号召人们集会，反对在德里东北部的贾夫拉巴德（Jaffrabad）举行、由妇女领导的抗议活动，并敦促人们“防止另一个沙欣·巴格的出现”。在集会上，他警告警方，如果抗议者不撤离现场，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在他发表演讲后不久就爆发了族群暴力。

## 过度使用武力

警察非法使用武力，并实施了其他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更滥用法律恐吓人民及以联邦政府的名义压制异议。

在 2 月德里的族群暴力事件中，德里警员与暴乱者一起投掷石块，对被拘留者施以酷刑，拆除和平抗议场所，并在骚乱者攻击和平抗议者以及破坏公私财产时袖手旁观。当局没有针对这些行为进行独立调查。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警方歧视性地执行封锁限制，此举加剧了有关人权的关切。大部分因为违反封锁指引而被拘押的人属于边缘化社区，例如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除名部落（De-notified Tribes）、穆斯林或低收入工人。3 月，正在返乡途中的移徙工人被北方邦警方强迫带着行李在路上爬行，作为对其违反封锁指引的惩罚。4

月 18 日，在北方邦，穆斯林男子穆罕默德·里兹万（Mohammad Rizwan）在外出购买必需品时被警察用警棍殴打，并于两天后在医院死亡。6 月 19 日，低收入工人贾雅拉吉（J. Jayaraj）和他的儿子贾本尼克斯（J. Bennicks）被泰米尔纳德邦杜蒂戈林县（Thoothukudi）的警察带走问话，原因是他们的小店在封锁期间仍然营业。据称，这两名男子在警察羁押期间被折磨致死。

## 有罪不罚

警察继续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非法杀人，其中一些构成了法外处决。7 月，在克什米尔，3 名苹果园的年轻劳工被印度军队成员非法杀害。《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对克什米尔安保人员使用武力的情况作出了规定，赋予安全部队成员实际豁免权，使他们不因被控实施侵犯人权行为而被起诉。7 月发生了另一场法外处决，据称，维卡斯·杜贝伊（Vikas Dubey）被北方邦警方拘捕后，在被押送到坎普尔市（Kanpur）的过程中遭杀害。他的 4 名同伙也被北方邦警察非法杀害。北方邦警方早些时候在一条推文中声称，自 2017 年以来，他们在 5,178 次“警察行动”中杀死了 103 名“罪犯”，另有 1,859 人受伤。“警察行动”是国家行为体常用的委婉用语，据称即法外处决。

涉及仇恨犯罪的行为也未受惩罚，其中包括针对达利特人（Dalits）、阿迪瓦西（原住民）社区及宗教少数群体的暴力行为。9 月，一名达利特妇女据称在北方邦哈特勒斯区（Hathras district）被一群占统治地位种姓的男子奸杀，北方邦警方未经其家人同意就将其火化。在全国爆发抗议后，被告人才被拘捕。后来，北方邦警方以犯罪共谋和煽动罪对抗议者录入了“第一信息报告”。

## 健康与生计权

当局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暴露了公共卫生保健系统的不足，还导致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宗教少数群体等缺乏足够社会及经济保障的人在不安全和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政府指责穆斯林塔比利吉贾马特（Tablighi Jamaat）少数民族传播新冠病毒，结果，卫生保健设施拒绝向穆斯林开放。2020 年 4 月，医院拒收穆斯林孕妇和癌症患者的事件浮出水面。在 3 月实行全国封锁后的数月里，社交媒体和 WhatsApp 群组充斥着对穆斯林进行社会和经济抵制的呼声，同时还有假的新闻报道和其他错误信息。

新冠疫情令公共卫生照护系统不堪重负，但对一线医务人员提供的保护却很少，例如有关安全设备以及医疗和人寿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当中包括在社区工作的人，如经认可的社会卫生活动人士（Accredited Social Health Activist）工作者及环卫工人。

最高法院推迟了对一起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的听证会，该案为因为突然实施封锁而滞留一月有余的移徙工人紧急寻求交通、食物和庇护所。4 月 7 日，许多移徙工人在没有政府资助或公共交通的情况下步行回到遥远的家乡，但印度首席大法官沙拉德·阿尔温德·博布德（S.A. Bobde）在审理请愿书时表示，最高法院“不想干涉政府未来 10-15 天的决定”。在封锁期间，至少有 200 名移徙工人在长途跋涉徒步回其他地区或邦的家乡时死于交通事故。5 月，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政府开始为滞留的移徙工人开通专列。然而，许多人在这些列车上因为缺乏食物和水而身亡，包括一名饿死的 4 岁儿童。

在封锁期间，由于工作岗位流失严重，占印度劳动力四分之三以上的非正规行业的工人面临巨大困难。然而，许多邦中止了原本给予工人的法律保护，诸如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定、组织工会及享有安全工作条件的权利。

在新冠疫情的封锁措施下，家暴等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增加。怀孕妇女和女童在寻求卫生保健服务时面临更多障碍，孕产妇死亡和发病的风险增加。

## 隐私权

4 月，政府推出了移动应用程序健康之路（Aarogya Setu），据说是为了加快追踪接触者，并确保民众及时获取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和公共卫生信息。当局未说明哪些政府机构可以获取通过该应用程序收集的数据。健康之路的代码未对外开放，这违反了政府自身的政策。尽管电子和信息技术部（Ministry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坚称，并不强制要求下载这款应用程序，但包括印度机场管理局（Airport Authority of India）在内的众多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都强制要求员工安装这一程序。

# 日本

## 日本

政府首长：**菅义伟**（于 9 月接替安倍晋三）

**政府出台了防止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在工作中受到骚扰的措施，却未通过任何法律来保护他们免受各方面的歧视。在新冠疫情期间，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事件有所增加。当局针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将某些少数民族排除在外。**

## 背景

8 月 28 日，安倍晋三在连续担任首相近 8 年后宣布辞职。原定于 2020 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UN Congress for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均因新冠疫情被推迟到 2021 年。

##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同志）的权利

6 月，一项法律经修订，以确保公司采取措施防止员工受到职位相对较高的工作人员的骚扰。修订内容包括一些规定，保护同志免受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出柜”或其他侵犯行为。中小企业可于 2022 年 4 月前出台相关措施，而大型企业则须立即遵守该规定。

中央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但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出台了承认同性结合的条例或指导方针，涉及 69 个城市，至年底时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18 年，反对党提出了一项禁止歧视同志的法案，截至年底，该法案仍在国会的审议当中。

##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报告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人数连续 16 年上升，这一数字在新冠疫情期间激增。<sup>1</sup> 4 月份报告的案件为 1.3 万件，相较 2019 年同期增长了 29%。

2019 年 12 月，记者伊藤诗织在针对一名知名男记者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胜诉，该名男记者在 2015 年邀请她吃饭讨论工作机会后对她实施了性侵犯。尽管他没有受到提出刑事指控，这一判决被认为是该国#我也是（#MeToo）运动的重要进展。在该国，性骚扰或其他此类侵犯的受害者很少发声。尽管在法院的诉讼中胜诉，伊藤诗织却在社交媒体上面临进一步的攻击，这使她在 6 月对一名女漫画家和两名男子提起诽谤诉讼。

## 歧视

新冠疫情期间，卫生工作者及其家人在寻求服务时面临歧视。据媒体报道，一些卫生工作者在上门出诊时权利受到侵害，或被拒绝提供医疗照护、出租车或餐厅服务。一些卫生工作者的家人被停职。尽管当局警告道，针对卫生工作者及其家人的歧视是不可接受的，但有媒体报道指出，卫生工作者的子女被拒绝提供日托服务和娱乐设施，或成为欺凌的对象。

负责分发新冠援助物资的当局歧视朝鲜族学校。3 月，埼玉（Saitama）市政府计划向为学龄前儿童提供照护或教育的工作者发放口罩，但把一家朝鲜族幼儿园排除在外。政府为受到疫情影响而面临财政困难的学生提供补贴，但位于东京之朝鲜大学校（Korea University）的学生不包括在内。这所大学的学生主要是朝鲜族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日本公民。<sup>2</sup>

## 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

3 月，当局报告称，在 2019 年的 10,375 份庇护申请中，有 44 份申请被接受为难民。现行法律允许当局无限期拘押包括寻求庇护者和非正规移民在内的无证外国国民，直到他们被驱逐出境为止。8 月，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审理两名寻求庇护者被拘押的案件时，指出有关的拘押是任意和歧视性的。

在新冠疫情期间，移民设施中的被拘者控诉环境过度拥挤、通风不良，而且缺乏适当的隔离措施来保护他们免受感染。为了减少移民拘留场所中的人数，当局暂时释放了过半计划于 4 月开始驱逐的被拘外国国民，但不允许他们工作，亦不向他们开放获得适足生活水平的途径。相反，公民社会组织为他们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援助。

## 死刑

日本政府今年没有执行死刑，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废除死刑。有智力和社会心理残障的人士继续面临被处决的风险。2 月，大阪地方裁判所驳回了松本健次（Matsumoto Kenji）第 8 次提出的再审申请。据称，他被警察胁迫“承认”两起抢劫和谋杀案后，于 1993 年被判处死刑。他自出生起就患有严重的智力残疾，并在拘留期间患上了妄想症。

2018 年，东京高等裁判所驳回了袴田岩的再审申请，当时他已被关在死刑区 46 年。12 月，最高裁判所推翻了东京高等裁判所 2018 年的裁决。

---

<sup>1</sup> 《家暴成影子疫情，日本涌现“新冠离婚”》（新闻报道，8 月 17 日）

<sup>2</sup> 《日本：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书——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6 日第 130 届会议》（ASA 22/3065/2020）

# 马来西亚

## 马来西亚

国家元首：阿卜杜拉（Abdullah）

政府首长：慕尤丁·亚辛（Muhyiddin Yassin，于 3 月接替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人权活动人士和批评政府者受到调查，无证移民被大规模突袭，难民船被推回海上，以上种种都导致了人权状况的恶化。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同志）继续面临歧视，原住民社区仍然受到伐木和采矿活动的威胁。人权改革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停滞不前，包括成立独立的警察监督委员会和废除强制性死刑。**

## 背景

2 月，变节的国会议员在新首相慕尤丁领导下组建了国民联盟（Perikatan Nasional），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联合政府垮台。为应对新冠疫情，该国从 3 月起实施《行动管制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之下。尽管新冠病毒在监狱爆发，超过 5,000 人受感染，当局没有因此而大幅减低在监狱服刑的人数。

## 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

人权捍卫者面临调查和指控，最常见的法律依据是《通信及多媒体法》第 233 条。3 月，活动人士法蒂雅·纳瓦（Fadiyah Nadwa Fikri）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举行反对政府更迭的示威游行而受到调查。法蒂雅和其他 18 名活动人士后因未就抗议活动提出通知而受到调查。<sup>1</sup> 5 月，当局报告自年初起已展开 262 项有关煽动的调查，其中 143 项调查是根据《通信及多媒体法令》进行。6 月，反对党议员泽维尔·贾亚库玛（Xavier Jayakumar）因批评政府未召开议会全体会议，被当局以违反煽动法而调查。同样在 6 月，电台名人张家扬（Patrick Teoh）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据称侮辱皇室成员的帖子而被控违反煽动法。

7 月，一名男子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被认为是侮辱伊斯兰教的帖子而被判处 26 个月的监禁。新闻网站当今大马（Malaysiakini）的颜重庆（Steven Gan）因读者评论被控藐视法庭。政府还调查了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和《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记者，二者分别报道了新冠疫情封锁下移民所受之待遇。

当局在 5 名工会活动人士举行和平示威，抗议不公平的劳工待遇、破坏工会的行为及医院工人的个人保护设备不足问题后，指控他们违反了《行动管制令》。<sup>2</sup> 法院后来撤销了指控。

## 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

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对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徙工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在仇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当局在移民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开展了包括逮捕和拘留在内的移民突击检查。移民拘留中心爆发了新冠疫情，600 余人被感染。<sup>3</sup>

当局拒绝让乘船抵达的罗兴亚难民进入该国，或将他们拘留在人满为患的设施中。<sup>4</sup> 4 月，海军将一艘载着数百人的船只拒之门外，船上载有妇女和儿童。当月，据称另一艘载有数百名罗兴亚难民的船只被拒进入马来西亚后，被孟加拉国当局接收。尽管政府在 4 月和 6 月允许两艘船登陆，但难民被拘留。其中一些人被根据移民法起诉，并被判处监禁和鞭刑，之后鞭刑被撤销。

关于移民被强迫劳动和居住于逼仄住房中的指控打击了马来西亚的橡胶手套行业，新冠疫情期间，该行业面临需求量增长的情况。橡胶手套工厂爆发新冠病毒，一名员工因提出住房过度拥挤的问题被解雇。此外，建筑工地也出现新冠肺炎爆发的情况。

## 人权捍卫者

人权捍卫者在政府更迭后面临调查，这当中包括净选盟（Bersih）的主席范平东（Thomas Fann）、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4）的反腐败活动人士仙蒂娅·加布里埃尔（Cynthia Gabriel），以及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的任斯文（Sevan Doraisamy）。<sup>5</sup> 7月，警方对非政府组织“难民的避难所”（Refuge for the Refugees）的创始人柯玉莉（Heidy Quah）展开调查，原因是她发表了一篇关于移民拘留中心恶劣条件的报道。柯玉莉还在网上受到了威胁，这凸显了人权捍卫者（尤其是女性捍卫者）面临的问题，包括受到骚扰，有时个人信息被公开，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不过，当局很少调查网络暴力事件。

##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同志）的权利

政府继续迫害同志。7月，伊斯兰事务部长祖基菲里·穆罕默德（Zulkifli Mohamad）在网上发表声明，“全面授权”宗教当局逮捕和“改造”同志。<sup>6</sup> 9月，于2019年被控“违反自然规律的性交未遂”的11名男子中，有一人对将同性性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法律提出了司法审查。截至年底，该案仍在审理。

## 原住民

全国各地的原住民依然因开发和伐木而面临着失去土地的威胁。2月，一项拟取消雪兰莪州（Selangor state）森林保护区官方保护的提案遭到了原住民社区的抗议，他们担心自己的家园和生计会受到影响。9月，彭亨州（Pahang state）的原住民对开发3个稀土矿的计划提出了抗议。

## 有罪不罚

8月，政府撤回了上届政府于2019年提出的建立警察监督委员会的法案，并提出了一项被广泛批评为无效的新法案草案。<sup>7</sup> 同样在8月，政府透露，1月至6月，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23名被拘留者在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sup>8</sup> 当局未对造成这几起死亡事件的原因展开有意义的调查。之后又发生了更多的拘留期内死亡案件，这当中包括印度国民兹尤丁（Zeawdeen Kadar Masdan），他在被移民当局拘留期间死亡。

## 死刑

8月，联邦法院宣布强制性死刑符合宪法。截至年底，上届政府提出的废除强制性死刑的立法修正案仍未提交议会。暂停执行死刑的规定仍有效力。

---

<sup>1</sup> 《马来西亚：一连串的调查显然意在恐吓和平抗议者》（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公开声明，3月4日）

<sup>2</sup> 《马来西亚：撤销针对医院工会活动人士的指控》（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公开声明，9月15日）

<sup>3</sup> 《马来西亚：紧急行动起来，阻止拘留中心新冠病例激增》（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公开声明，6月5日）

<sup>4</sup> 《马来西亚：数百名乘船寻求安全的罗兴亚人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风险》（新闻报道，4月8日）

<sup>5</sup> 《马来西亚绝不能让活动人士及异议者重回充满恐惧的环境》（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公开声明，6月12日）

<sup>6</sup> 《马来西亚：政府须停止迫害跨性别者》（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公开声明，7月11日）

<sup>7</sup> 《马来西亚：拟议之警监会法案是没能确保警察问责的可耻倒退》（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公开声明，8月28日）

<sup>8</sup> 《马来西亚：政府须对拘留中心的死亡事件负责》（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公开声明，8月7日）

# 缅甸

## 缅甸联邦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温敏 (U Win Myint)**

军方与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之间的内部武装冲突不断之际，缅甸各地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军方在若开邦和钦邦实施了无差别的空袭和炮击，成千上万的平民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团体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与高危人群接触的渠道因此受限。在若开邦和钦邦，当局对获取信息的渠道施加了不当限制，影响了社区在新冠疫情及持续的武装冲突期间获得潜在挽救生命的信息的能力。在全国各地，人权捍卫者继续受到迫害。当局对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权加以任意限制。

## 背景

1月23日，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下令缅甸在冈比亚提起的诉讼未有裁决前停止对罗兴亚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行为。该法院还下令缅甸定期报告这一命令的执行情况。<sup>1</sup>

政府一再强调，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属于内政。不过，有罪不罚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且，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来建立平民对军队的监督或建立有效的内部调查及问责机制。

新冠疫情发生后，随着病例的不断增加，各大城市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该国的医疗系统没有能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疫情，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对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和数百万贫困人口在内的高危人群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11月8日举行的大选中，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保住了议会的多数席位。

在该国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包括若开邦的大部分地区，投票被取消。结果，逾150万人被剥夺了投票权，其中主要是若开族人。在2015年大选之前，绝大多数罗兴亚人已经因为被称为“白卡”（White Card）的身份证作废而被剥夺了选举权。

## 武装冲突下的侵犯人权行为

在这一年里，军方在若开邦的许多地区和钦邦的百力瓦镇（Paletwa township）实施无差别空袭和炮击，造成平民死伤。<sup>2</sup>

自2019年初军方与若开军之间的冲突升级以来，强迫劳动、任意羁押，以及政府军对平民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案件有所增加。

在克钦邦和掸邦北部，几次武装冲突中继续出现有关军队侵犯平民人权的报告。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侵犯人权，涉及绑架、谋杀、非法拘押、强迫招募人员及儿童加入武装团体、强迫从事搬运工作以及敲诈勒索。

6月12日，联邦社会福利、救援和安置部部长宣布，将设立两个机构在全国清除杀伤人员地雷，作为重新安置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平民计划的一部分。军队和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继续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及简易爆炸装置。<sup>3</sup>

## 国内流离失所者

由于缅甸军方与各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若开邦、钦邦、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约有30万人流离失所。泰缅边境沿线，数万人仍因几十年前的冲突而流离失所。

这一年里，若开邦有数万人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这加剧了该邦现有的流离失所危机。自2012年的暴力事件发生以来，该邦有13万名主要是罗兴亚族穆斯林的人被实际关押在难民营中。在克钦邦，自2011年克钦独立军与军方重新开战以来，近10万人仍在难民营中流离失所。

政府指定关闭多所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但年内无一所营地被关。至于2016及2017年逃离若开邦暴行到了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其遣返工作尚未开始。

## 阻止人道救援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开展活动时面临重大障碍。当局限制其进入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以及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争夺政权的地区。

在若开邦，人道主义行动者受到的限制尤为严重，臃肿的官僚体系和政府实施的出行禁令禁止其接触高危人群，包括在冲突和流离失所的情况下。

人道主义团体在若开邦内行动时存在风险。4月，世卫组织一辆运载新冠测试样本的车辆在若开邦敏比亚镇（Minbya township）遭到枪击，司机被射杀。10月28日，在拉代当镇（Rathedaung Township），两名男子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救援船上受伤，另有一人死亡。缅甸军方和若开军都否认对他的死亡负责。

## 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

当局利用一系列压制性的法律，拘捕、起诉和监禁行使言论、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权的人。

今年内，任意及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和起诉导致58人被监禁。<sup>4</sup>当局经常根据2013年《电信法》第66(d)条和殖民时期《刑法》第505(a)及505(b)条，对异议人士及人权捍卫者提出指控。

当局根据这两项法律以“网络诽谤”的罪名起诉诗歌团体孔雀世代（Peacock Generation），原因是他们和平的姐恰（Thangyat）表演批评了军方。姐恰是一种融合了诗歌、喜剧和音乐的传统艺术，以讽刺时弊为目的，在每年4月的新春泼水节期间演出。该团体的6名成员被判处2至6年监禁。截至年底，3人仍在狱中。

当局利用国家安全立法任意限制言论和信息自由权。1908年的《非法结社法》经常被当局用来针对、骚扰、恐吓和惩罚活动人士和记者，特别是那些属于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人。

3月24日，政府将若开军定性为恐怖组织，这实际上禁止了与该组织的任何联系。至少有3名记者因与若开军接触而被根据《反恐怖主义法》以及《非法结社法》第17(1)条和第17(2)条起诉。媒体工作者实行自我审查，并常常透露由于担心受到指控而不能联系相关的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以获悉其观点。

根据《和平集会与和平游行法》，和平示威或游行等公共集会的组织者必须在活动前通知警方，否则可能导致刑事处罚。9月4日，诗人兼活动人士貌桑哈（Maung Saungkha）被根据该法第19条判决有罪，原因是他在若开邦和钦邦部分地区纪念移动互联网通信受限一周年的抗议活动中，在高速公路上挂起了横幅。貌桑哈选择支付3万缅元（22.5美元）的罚款代替服刑15天。

9月，当局逮捕了全缅甸学生会联合会（All Burma Federation of Student Unions）的15名成员。他们参加了全国各地的和平反战示威和宣传活动，呼吁结束若开邦和钦邦的冲突，并要求恢复被政府下令降低网速的地方的移动互联网服务。

其中6人被根据《刑法典》第505(a)和505(b)条起诉；一人被根据《自然灾害管理法》第25条起诉，还有8人被根据《和平集会与和平游行法》第19款起诉。法院在几起案件中判处最高6年监禁，法律程序仍在进行中。其他全缅甸学生会联合会的成员仍在躲藏中。

## 信息的获取

8月，政府部分取消了2019年6月在若开邦北部和钦邦南部受冲突影响地区实行的移动互联网连接限制。在恢复服务的地区，连接速度大幅下降。这阻碍了信息的流动，特别是记录人权侵犯及侵害行为的信息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传播重要的卫生信息。

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诉诸广泛的权力封锁批评政府的网站，其中《电信法》赋予了政府宽泛及任意的权力以中断电信网络。在3月19至31日期间，当局发布了3项指令，根据《电信法》第77条封锁了共2,147个网站。

当局在受冲突影响地区对接触独立媒体和人权观察员施加了限制。记者和媒体机构因报道敏感问题而面临压力、恐吓和骚扰。报道冲突者面临巨大的被捕风险，少数民族记者尤其受影响。担任主编的昂明乌（Aung Marm Oo）仍旧藏身于他2019年5月以来躲藏的地点，其工作的新闻机构在若开邦，报道军方与若开军冲突期间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他被控违反《非法结社法》第17(2)条，当中规定任何管理、协助或促进非法结社的人可被判处最高5年的监禁。

## 企业问责

9月，跨国企业被曝光与军队收受资金之间有关联，其中涉及许多对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泄密的官方文件揭示，军方从缅甸经济控股有限公司（Myanmar Economic Holdings Limited）的股份中获得巨额收入，该公司是一个秘密的企业集团，其活动涵盖采矿、啤酒、烟草、服装制造和银行业。<sup>5</sup>

##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同志）

《刑法》第377条将双方合意的同性关系定为犯罪。虽然这一条款很少被执行，但由于它仍然有效，结果营造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让针对同志的骚扰、歧视和暴力行为合法化，使他们有受到警察和其他当局攻击和勒索的风险。

## 受教育权

2月13日儿童节当日，一发炮弹落在布迪当镇（Buthidaung township）三茵维乡（San Hnyin Wai Village Tract）卡瑞羌村（Kha Mhwe Chaung village）的小学后基础教育学校，至少有17名学生受伤。

军方占领了若开邦的学校建筑，将其作为临时基地。占用教育设施不仅剥夺了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把学校变成军事目标，使平民的生命和安全受到威胁。

## 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

《预防和保护妇女不受暴力侵害法》（PoVAW）的立法进程停滞不前。议员们继续就法律草案的关键条款进行辩论，包括关于强奸的定义。根据《刑法》，婚内强奸不被视为犯罪。尽管最新版本《预防和保护妇女不受暴力侵害法》将婚内强奸定为刑事犯罪，但其刑罚比婚外强奸要轻。

独立调查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Enquiry）是缅甸国内负责调查2016及2017年发生的针对若开邦罗兴亚人暴行的机构。1月21日，该委员会发布了调查结果的摘要，称“没有证据表明缅甸安全部队实施了轮奸”。然而，委员会承认，没有访问逃往孟加拉国的罗兴亚穆斯林幸存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说法与人权团体、执业医师以及联合国缅甸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UN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on Myanmar）的调查结果存在直接矛盾，后者记录了广泛存在系统性地强奸罗兴亚族妇女和女童的情况。

9月11日，军方承认3名士兵于6月30日在若开邦拉代当镇的行动期间强奸了一名若开族妇女，尽管其在该名幸存妇女7月提出强奸指控并最初被当地媒体报道时对此予以否认。军方在关于该事件的声明中公开了幸存者的名字，但却没有曝光加害者的姓名。12月底，3名士兵各被判20年苦役徒刑。

- 
- <sup>1</sup> 《国际法院下令缅甸保护罗兴亚人》（新闻稿，1月23日）
  - <sup>2</sup> 《缅甸：随着若开邦冲突的恶化，无差别空袭令平民丧生》（新闻稿，7月8日）
  - <sup>3</sup> 《缅甸：若开邦冲突升级，村庄被烧，平民死伤》（新闻稿，10月12日）
  - <sup>4</sup> 《“我不会屈服”：缅甸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被刑事定罪》（简报，4月13日）
  - <sup>5</sup> 《缅甸：泄密文件揭示全球商业与军方犯罪的关系》（报告，9月10日）

# 俄罗斯

## 俄罗斯联邦

国家元首：**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政府首长：**米哈伊尔·米舒斯京** (Mikhail Mishustin, 于 1 月接替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新冠疫情暴露了医疗资源长期短缺的问题。当局以疫情为借口，通过修改措辞含糊的“假新闻”法及收紧对公众集会的限制等方式，继续打压所有异见者。和平抗议者、人权捍卫者、公民和政治活动人士面临逮捕和起诉。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s Witnesses) 受到的迫害加剧。酷刑仍然普遍存在，施害者几乎完全不受制裁。公正审判权经常受到侵犯，法律修订进一步削弱了司法独立。在新冠封锁期间，家庭暴力的报告数量急剧增加，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草案仍在议会中停滞不前。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人 (同志) 继续面临歧视和迫害。数以千计的移民劳工在疫情期间失业，但由于边境封锁而无法离开。有证据证实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犯下了战争罪。

## 背景

油价下跌、投资减少及外国制裁带来的经济衰退因新冠疫情而加剧，并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进一步陷入贫困。抗议活动缓缓且持续增加，不满情绪也在扩散。各级政府面对的腐败指控不断增加，但却视而不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政府宣布的新冠应对措施，诸如延长所有工人的全薪假期等，未能回应人们广泛的关切。

当局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改，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消除普京总统未来参加总统选举的法律限制。

俄罗斯对邻国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亦继续占领克里米亚和其他领土。

## 健康权

新冠疫情给医疗卫生系统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暴露出长期资源不足的问题。全国各地经常有报道称医院床位、关键性防护设施、医疗设备和药品短缺，还有卫生工作者被拖欠薪酬的问题。有关感染率和死亡率的官方和独立报告数字差距悬殊，这表明存在政府瞒报问题。

## 卫生工作者

举报的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团体面临报复，包括受到惩戒措施和因“假新闻”被起诉。

医生塔季亚娜·列夫瓦 (Tatyana Revva) 多次投诉防护设备短缺和不足后，遭到恣意斥责并被以撤职为威胁。警方在收到医院的主任医生投诉后进行调查，其后驳回了针对她的“假新闻”指控。<sup>1</sup>

## 监狱条件

监狱机构提供的医疗照护与卫生设施仍然不足，并因疫情进一步恶化。虽然当局采取了限制性和额外的卫生措施，但并未采取步骤减少监狱人口。独立监测机构认为，官方有关羁押人员的新冠感染数据不可靠。

## 集会自由

12月实行了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后，和平集会的自由继续受限。为应对疫情，有关公众集会和单人罢工纠察的规定进一步收紧，有些地区甚至完全禁止了这些活动。尽管当局秋后算帐，公共抗议活动常有发生，但通常规模较小。被拘捕和起诉的单人罢工纠察员人数急剧增加。

7月15日，一百多名反对修改宪法的和平抗议者被任意拘捕，至少3人在莫斯科遭到了警察的毒打。数十人被处以巨额罚款，或被拘押5至14天。

7月9日，曾在2018年击败亲克里姆林宫候选人后当选远东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地区区长的谢尔盖·富尔加尔（Sergei Furgal）被捕，这引发了群众在哈巴罗夫斯克每周一次的和平抗议活动及俄罗斯各地的声援抗议行动。成千上万人罕见地被允许在哈巴罗夫斯克多次游行，直到警察于7月18日实施了首次拘捕。10月10日，警方首次驱散抗议活动，拘捕了至少25人，之后至少有5人被拘押数日。哈巴罗夫斯克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

12月，因“屡次违反”有关公众集会的规定而于2019年入狱的和平活动人士康斯坦丁·科托夫（Konstantin Kotov）获释。1月，宪法法院下令对他的案件进行复审。4月，莫斯科市法院将他的刑期从4年减为18个月。因同一罪行被起诉的人还包括12月被判缓刑两年的政治活动人士尤利娅·加里亚马纳（Yulia Galyamina）、在科洛姆纳（Kolomna）受审的活动人士维亚切斯拉夫·埃戈洛夫（Vyacheslav Egorov），以及哈巴罗夫斯克的抗议者亚历山大·普里霍德科（Aleksandr Prikhodko）。12月，亚历山大·普里霍德科的案子被撤销。

警察常常对抗议者诉诸过度和不必要之武力，却又允许其他抗议者团体使用暴力。在巴什基里亚（Bashkiria）的库什陶（Kushtau），反对当地一个采矿项目的和平环保活动人士多次受到私人保安人员的攻击，那些保安人员却不受惩罚，有时还与警察一起行动。8月9日夜里，约30名私人保安和约100名蒙面男子袭击了10名环保活动人士所在的营地。警方接到报警，但并未介入。事件引发了当地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迫使该采矿项目在8月底被关闭。

## 言论自由

当局继续限制言论自由。2019年，当局首次通过所谓的“假新闻”法。今年4月1日，该法经修订，“故意传播有关公民生命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和/或有关政府保护民众之行动的虚假信息”，属于刑事犯罪。如果传播信息导致人身伤害或死亡，个人将面临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媒体将被处以巨额罚款。数百人在行政程序中被罚款，至少37人因违反该法而面临刑事诉讼，当中许多人是批评政府的民间活动人士、记者或博客作者。至少有5家媒体被起诉。8月和9月，《新报》（Novaya Gazeta）及其主编因发表新冠相关文章而被罚款两次，并被勒令删除网上相关文章。

## 记者

记者继续受到骚扰、起诉和人身攻击。6月30日，圣彼得堡的警察在一个投票站袭击了记者大卫·弗伦克尔（David Frenkel），并将其胳膊打断。10月15日，哈巴罗夫斯克的记者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Sergei Plotnikov）被蒙面人绑架后载到树林里，在那里遭到殴打并被模拟处决。他一获释就向警方报了案，但到年底，他仍然不知是否进行了任何调查。

下诺夫哥罗德（Nizhnii Novgorod）的记者伊琳娜·斯拉维娜（Irina Slavina）经常受到当局的骚扰。10月1日，她的家被突击搜查，警察根据“不受欢迎组织”法传唤她在涉及当地一名活动人士的刑事案件中做证人。10月2日，她在地区警察总部前自焚抗议后丧生。

7月6日，普斯科夫一家军事法庭判处记者斯维特拉娜·普罗科皮耶娃（Svetlana Prokopieva）“公开为恐怖主义辩护罪”罪名成立，对她处以50万卢布（6,300美元）的罚款，理由是她对压制政策的公开评论可能导致一名17岁男子在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联邦安全局大楼附近把自己炸飞。

## 互联网

针对互联网的审查仍在继续。6月，欧洲人权法院在弗拉迪米尔·哈里诺弗诉俄罗斯（Vladimir Kharitonov v. Russia）和其他三起案件中裁定，互联网封锁措施“过度 and 任意”，侵犯了传递和接受信息的权利。莫斯科一家法院因谷歌（Google）的搜索引擎列出了俄罗斯当局禁止的“危险内容”，在8月和12月分别对其处以150万卢布（约合18,899美元）和300万卢布（约合40,580美元）的罚款。12月，普京总统签署了一项法律，对封锁俄罗斯媒体内容的外国互联网平台实施制裁。12月通过的另一项法律规定对通过互联网实施的诽谤行为处以监禁。

## 镇压异议

反对派活动人士和其他异见者面临严厉报复。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反腐败基金会卷入出于政治动机的诉讼，其下属的126个银行账户因此于1月被冻结，随后，他及其他人被提起诽谤的刑事和民事诉讼。8月20日，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从托木斯克（Tomsk）起飞的航班上病倒，并被紧急送医，后送往德国，在那里被诊断为一种军用级别的神经毒剂中毒。俄罗斯当局并未调查这起中毒事件。

曾发誓要将普京总统从克里姆林宫“清除”的西伯利亚萨满巫师亚历山德·加比雪夫（Aleksandr Gabyshev）在拒绝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后，于5月12日被关入精神病医院。俄罗斯在国内外受到批评，其后，他于7月22日出院。

6月，政治博客作者尼古拉·普拉托什金（Nikolay Platoshkin）因策划反对宪法修正案的和平抗议活动，被当局以“煽动群众骚乱”和“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的罪名软禁。

## 人权捍卫者

人权捍卫者受到骚扰、起诉和人身攻击的情况仍很常见。

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的活动人士亚历桑德拉·科罗廖娃（Alexandra Koroleva）和索契（Sochi）的活动人士森永·西莫诺夫（Semyon Simonov）因各自的非政府组织未支付被任意处以的巨额罚款而遭起诉，并面临被监禁的风险。

2月6日，记者埃琳娜·米拉西娜（Elena Milashina）和律师玛丽娜·杜布罗维纳（Marina Dubrovina）在车臣格罗兹尼（Grozny）的一家旅馆里被一群暴徒殴打。<sup>2</sup> 一项正式的调查于3月份启动，但显然没有成效。与此同时，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对埃琳娜·米拉西娜发出了几乎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却并未受到任何惩罚。

律师米哈伊尔·贝尼亚什（Mikhail Benyash）早前被刑事定罪，有可能因此被吊销执照。他针对该刑事判决的上诉于10月开始，到年底时仍在审理中。

## 结社自由

当局积极利用关于“外国代理人”和“不受欢迎组织”的法律来抹黑独立非政府组织，使它们失去资金，并严厉惩罚其成员。12月，更多严苛的法律修订被签署成为法律，其中包括将“外国代理人”的规定扩大到涵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未注册的团体和个人。

4月，教育非政府组织“投影仪”（Projectoria）为避免罚款而被迫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其外国捐助者和项目（Project Harmony）则被宣布为“不受欢迎”。

10月，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的活动人士亚娜·安东诺娃（Yana Antonova）被判240小时强制劳动，原因是她与“不受欢迎组织”有联系、在网上转发有开放俄罗斯（Open Russia）标记的资料，以及参加单人罢工纠察队。随后，她又被根据新的行政程序处以罚款。

## 宗教和信仰自由

当局以“极端主义”罪名起诉耶和华见证人的情况不断升级，包括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被定罪的人越来越多，刑期也越来越长。截至年底，共有362人接受调查或受审，39人被定罪，6

人入狱。例如，阿尔特姆·格拉西莫夫（Artem Gerasimov）在 6 月的上诉中被克里米亚实际上的最高法院判处 6 年监禁，罚款 40 万卢布（合 5,144 美元）。

## 酷刑和其他虐待

该国仍然普遍存在酷刑和其他虐待现象，被定罪的犯罪者寥寥无几。这些人通常仅遭起诉“滥用职权”的罪名，其后被从轻发落。

一段外泄的视频显示 2017 年一名囚犯遭到了殴打，随后，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流放地的 12 名前监狱官员被判处最高 4 年零 3 个月的监禁，其中 6 人因拘押时间与刑期相抵而被立即释放，流放地的前领导人和副领导人则被无罪释放。

## 不公审判

侵犯公正审判权的现象依然普遍。被拘留者遭剥夺了与律师会见的权利，一些审判继续不对公众开放，新冠疫情常常被滥用为这些行为实施的正当理由。

7 名来自奔萨（Penza）和 2 名来自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的年轻人被控参与一个不存在的组织，名为“网络”（Network），并分别于 2 月和 6 月被以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判处长达 18 年的监禁。许多关于酷刑和其他虐待以及伪造证据的指控都被置若罔闻。<sup>3</sup>

宪法和立法修正案进一步侵蚀了公正审判的权利，包括赋予总统提名宪法和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以及任命所有联邦法官和解雇高级联邦法官的权力。

## 反恐怖主义

反恐法律被广泛滥用，常常用于打击异见。

达吉斯坦（Dagestan）记者阿卜杜勒姆明·加德耶夫（Abdumumin Gadzhiev）因莫须有的资助恐怖主义及参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指控而继续被拘押，对他的审判于 11 月开庭。

伊斯兰组织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于 2003 年被俄罗斯政府定性为“恐怖主义”运动，而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当局经常以克里米亚鞑靼人（Tatar）加入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为由，借机监禁他们。克里米亚人权捍卫者埃米尔·乌瑟因·库库（Emir-Usein Kuku）早前被判 12 年有期徒刑。6 月，他在上诉中败诉。9 月，另一名克里米亚人权维护者塞尔韦尔·穆斯塔法耶夫（Server Mustafayev）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

19 名来自巴什基里亚乌法（Ufa）的男子之前遭指控是伊扎布特成员，被判罪名成立和判处 10 至 24 年有期徒刑。9 月，该 19 名男子在上诉中败诉，其中一人的刑期被减少了一年。

## 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

针对家庭暴力的立法提案仍在议会中停滞不前，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报告称，在新冠封锁措施实施之后，家庭暴力的数量急剧增加。

6 月，欧洲人权法院在波尔什纳诉俄罗斯（Polshina v. Russia）案中裁定，俄罗斯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法律制度有缺陷，因而违反了禁止酷刑和歧视的规定。法院强调，俄罗斯一贯不对家暴问题进行调查，并且常年容忍“有利于家庭暴力发生的氛围”。

##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同志）的权利

同志继续面临歧视和迫害。宪法修正案重新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强化了对同性婚姻的现有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包括对同性夫妇收养小孩在内的限制。

同志权活动人士尤利娅·茨韦特科娃（Yulia Tsvetkova）因在网上发布支持同性伴侣的绘画而被罚款 75,000 卢布（1,014 美元），还面临其他处罚，包括因为以女性生殖器为主题的身体正面绘画而正在受到的色情指控。<sup>4</sup>

## 移民的权利

逾三分之一的外籍移徙劳工报告称因疫情而失业，数千人因相关的边境封锁措施滞留俄罗斯。4 月，一项总统令放宽了对移民和难民的工作许可及居住规定，并暂停强制遣返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一些地区当局停止了对移民的临时拘留，不过也有报告称有新的强行遣返决定。

## 非法袭击

证人证言、视频、照片和卫星图像等证据证实了俄罗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以致构成战争罪的指控。有关证据涉及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间俄罗斯部队对叙利亚境内的医疗设施和学校进行的 7 次空袭，以及叙利亚或俄罗斯部队进行的 4 次空袭（见叙利亚部分）。<sup>5</sup>

---

<sup>1</sup>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医生受到的迫害仍在继续：塔季亚娜·列夫瓦》（EUR 46/2970/2020，9 月 2 日）

<sup>2</sup> 《俄罗斯：知名调查记者和律师在访问车臣期间遭到袭击》（新闻报道，2 月 7 日）

<sup>3</sup> 《俄罗斯：当局不得再以身为不存在的“恐怖”组织成员为名进行起诉》（新闻报道，2 月 7 日）

<sup>4</sup> 《俄罗斯联邦：活动人士因女性人体绘画面临牢狱之灾：尤利娅·茨韦特科娃》（EUR 46/2977/2020）

<sup>5</sup> 《叙利亚：“没有哪儿对我们来说是安全的”：叙利亚西北部的非法袭击和大规模流离失所问题》（MDE 24/2089/2020）

# 沙特阿拉伯

## 沙特阿拉伯王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

当局对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打压加剧。在被骚扰、任意拘押、起诉和/或监禁的人中，有政府异议人士、女权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的亲属、记者、什叶派少数民族成员，以及在网上批评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人。截至年底，几乎所有沙特阿拉伯国内已知的人权捍卫者都已被拘押或监禁。专门刑事法院 (Specialized Criminal Court) 和其他法院继续进行严重不公的审判。法院大规模适用死刑，人们因各类罪行被处决。由于疫情，移徙工人更易受到虐待和剥削，数以千计的人被任意拘押在恶劣的条件下，使得数目不明的人死亡。

## 背景

自 2017 年海湾地区开始发生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起，该国便与巴林、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联酋) 一起保持对卡塔尔的经济和政治制裁。

在也门长期的武装冲突中，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继续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见也门部分)。

3 月，沙特通讯社 (Saudi Press Agency) 公布，国家反腐败委员会 (Nazaha) 逮捕了 298 名公共部门官员，正在调查他们的腐败问题。

5 月，为应对油价暴跌和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当局出台了紧缩措施，将增值税提高三倍至 15%，并取消了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补贴。

11 月，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通过网络举行，由沙特主持。逾 220 个公民社会组织公开表示不参加同步进行的公民社会互动活动，以此抗议沙特阿拉伯政府的人权记录。

## 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

当局加强了对言论、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权的打压，包括通过压制网络言论，以及对与政府应对新冠措施相关的言论自由施加不当限制。当局骚扰、任意拘押并起诉政府批评者、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的家人及许多其他人。

3 月，检察院宣布，根据《反网络犯罪法》第 6 条，质疑或煽动反对新冠宵禁的社交媒体帖文将受到惩罚，该条款所载之最高处罚为监禁 5 年及罚款近 300 万沙特里亚尔 (80 万美元)。

法院经常利用《反网络犯罪法》对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政府批评者及人权捍卫者判刑，并援引其推文或其他和平的网上言论为证据。

当局继续禁止组建政党、工会和独立的人权团体，并起诉和监禁那些成立或参与未经当局许可的人权组织的人。根据内政部于 2011 年发布的命令，包括和平示威在内的所有集会仍然被禁止。

王室家族成员、前政府官员及其亲属都是任意拘捕或羁押的对象。在前国王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 (Saud bin Abdulaziz Al Saud) 的女儿兼作家、人权活动人士巴斯玛·本特·沙特公主 (Basmah bint Saud Al Saud) 被拘捕的一年之后，一个官方推特 (Twitter) 账号于 4 月确认了她未经指控而被羁押。其家人对她的健康表示担忧，因为她患有需要治疗的疾病。

## 人权捍卫者

当局任意拘押、起诉和监禁从事和平活动与人权工作的人权捍卫者及女权活动人士的家属，其依据包括《反恐怖主义法》和《反网络犯罪法》。截至年底，几乎所有的沙特阿拉伯人权捍卫者都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被羁押，或正在接受审判或在监狱服刑。

未出庭或未受到指控而被任意长期拘押者中，包括穆罕默德·巴贾第（Mohammed al-Bajadi）。他是沙特公民及政治权利协会（Saudi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ssociation）的创始成员，自2018年5月起便被拘押。

4月，良心犯、沙特公民及政治权利协会的创始成员阿卜杜拉·哈米德（Abdullah al-Hamid）在被拘押期间因为医疗疏忽身亡。他曾就人权和司法独立问题写过大量文章。<sup>1</sup>4月底，当局拘捕了对他的去世表示同情的作家及其他人，这当中包括经济学家、作家和前财政部副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达希勒（Abdulaziz al-Dakhil）。

在针对妇女人权捍卫者和支持者的逮捕浪潮发生的两年多之后，当局继续将卢加因·哈斯洛尔（Loujain al-Hathloul）和纳西玛·萨达（Nassima al-Sada）羁押，禁止她们与外界联系，每次关押均长达2至4个月。在其案件于11月被提交至专门刑事法院审理后，卢加因·哈斯洛尔在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法院暂缓执行其中2年10个月的刑期。另有几名妇女活动人士继续因其人权工作或言论而被拘押并在利雅得的刑事法院受审。

## 不公审判

专门刑事法院继续进行严重不公正的审判，这一反恐法庭以违反正当程序（包括进行公审）而臭名昭著。<sup>2</sup>在有关法庭审理后继续受审或被定罪的人中，包括一名妇女人权捍卫者、宗教神职人员和活动人士，他们因和平表达意见而被控犯罪，其中包括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

3月，特别刑事法院开始对68名巴勒斯坦、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国民进行公审，他们根据《反恐怖主义法》受到莫须有的指控。其中两人是穆罕默德·胡达里（Mohammed al-Khudari）和他的儿子哈尼·胡达里（Hani al-Khudari），他们被控“加入恐怖主义实体”，该实体据了解是加沙的实际掌权者哈马斯。二人在被拘押的第一个月被强迫失踪，并被隔绝和单独关押了两个月。他们自被拘捕以来就被拒绝获得律师代理。

6月，自2019年4月以来因和平支持女权运动和女性人权捍卫者而被拘押的14人被控违反《反网络犯罪法》或《反恐怖主义法》或被控同时违反两项法律。这当中包括萨拉赫·海达尔（Salah al-Haidar），他的母亲是因为从事女权工作而仍在受审的妇女人权捍卫者阿齐扎·尤瑟夫（Aziza Al-Yousef）。

9月，8人就2018年沙特阿拉伯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土耳其被谋杀一案收到终审判决。利雅得的一个刑事法庭对5名初判死刑的人进行了减刑，并对8人全部判处7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当局允许外交官听审，但审判不向媒体和独立观察员开放。此外，受审者的身份和他们面临的指控都没有对外披露。

同样在9月，特别刑事法院判处作家兼学者阿卜杜拉·马利基（Abdullah al-Maliki）有期徒刑7年，原因是他在推文和其他网上发帖中论及言论自由和政治代表性，并为沙特公民及政治权利协会成员辩护。他还被指控主持了一个讨论书籍和哲学的知识分子论坛，罪名是“煽动公众舆论反对国家统治者”。

## 死刑

法院继续判处死刑，并针对各种罪行执行了数十次处决。

4 月，一项王室命令宣布，若依照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法）可对一项罪名酌定量刑，则会对案发时未满 18 岁的人停止适用死刑。该命令符合 2018 年公布的《青少年法》，当中禁止法官对不满 15 岁的人酌情判处死刑。但该法并不禁止法官在涉及哈德（hadd）罪行（即：伊斯兰教法中规定有固定和严厉惩罚的罪行）或应受血债血还（qisas）惩罚的案件中对该年龄组适用死刑。

8 月，沙特阿拉伯人权委员会在拖延已久后，终于宣布该国检察官已下令审查对阿里·尼姆（Ali al-Nimr）、阿布杜拉·扎赫尔（Abdullah al-Zaher）和达乌德·马洪恩（Dawood al-Marhoon）的死刑判决，这 3 人面临即将被处决的危险。<sup>3</sup> 这 3 名青年男子在 2012 年被捕时还是儿童，他们的控罪跟参与东部省份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关。12 月，检察院复审穆罕默德·法拉杰案的惩罚，要求对他处以监禁，而不是处决他。穆罕默德·法拉杰是什叶派少数民族，在 15 岁时因参与东部省份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而被拘捕。

当局在死刑案件中并没有遵守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常常适用秘密的简易程序，亦不允许被告获得法律代理或法律援助。外籍国民往往在拘押和审判的各个阶段都无法得到翻译服务。

## 司法肉刑

4 月，司法部长向所有法院发出通知，执行最高法院的决定，终止适用自由裁量的鞭刑，代之以监禁和/或罚款。但是在伊斯兰教法规定进行强制惩罚的案件中，鞭刑继续适用。

目前仍不清楚对博客作者拉伊夫·巴达威（Raif Badawi）的鞭刑是否已被撤销。2014 年，他因“侮辱伊斯兰教”和创办网上辩论论坛而被判处 1,000 下鞭刑及 10 年监禁，并在出狱后被禁止出国 10 年以及处以巨额罚款。2015 年 1 月，他被执行了 50 下鞭刑。其余的鞭刑被推迟，最初是出于医疗原因，此后被推迟的原因不明。

## 妇女和女童的权利

协商会议（Shura Council）为君主政体提供建议。7 月，协商会议的议员提议修改《沙特国籍法》的执行细则，以在不收取任何费用或不经冗长程序的情况下，给予与外国国民结婚的沙特阿拉伯女性的子女永久居留权。这是针对《国籍法》的缺陷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因为该法禁止与外国公民结婚的沙特阿拉伯妇女将其国籍传给子女。

同样在 7 月，该国出现了一项积极的发展，法院在沙特阿拉伯妇女玛丽亚姆·奥泰比（Maryam al-Otaibi）的案件中裁定，“成年、理性的妇女独立生活并非罪过”，她因离家而被自己的父亲（亦是她的监护人）告上法院。玛丽亚姆·奥泰比曾积极参与废除监护人制度的运动。在监护人制度之下，男性监护人可对妇女提起“缺席”诉讼。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当局打算废除对未经监护人许可逃离家庭的妇女入罪的制度。

在法律和实际生活中，妇女和女童继续在婚姻、离婚和继承方面受到歧视，而且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免受性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遭受过家庭暴力的人依然需要男性监护人的许可才能离开庇护所。

## 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同志）的权利

在沙特阿拉伯，“同性恋”行为仍然被禁止，可被处以鞭刑和监禁。

7 月，也门同志权利捍卫者穆罕默德·博卡里（Mohamed al-Bokari）被判处监禁 10 个月，随后被驱逐回也门，其罪名是违反公共道德、在网上宣扬同性恋和模仿女性。他在一段捍卫同志个人自由的视频中露面后被捕。

## 移徙者的权利

3 月，在爆发新冠疫情之初，当局无偿延长了外籍劳工的居留许可，沙特人权委员会宣布释放 250 名因非暴力移民和居留罪而被拘留的外国人。

然而，沙特阿拉伯约一千万名移徙工人继续受制于卡法拉（kafala）(担保)制度，使得雇主可行使不成比例的权力，而未经雇主许可，他们被禁止离开该国或更换工作，这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劳工虐待和剥削。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一情况使得移徙工人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再加上生活条件恶劣、缺乏法律保障，以及获得预防性医疗保健和治疗的机会有限，他们亦更容易受到新冠病毒感染。

自 3 月以来，数千名埃塞俄比亚移民被任意拘押在全国各地至少 5 个条件恶劣的拘留中心内，包括孕妇和儿童。被拘者表示，他们缺乏足够的食物、水、医疗卫生、卫生设施及衣服。牢房人满为患，被囚者无法外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具体需求未得到满足。新生儿、婴儿和青少年被关押在与成年人一样的恶劣条件下。<sup>4</sup>

虽然外界很难确定拘押期间的死亡人数，也很难证实所有这些指控，但接受采访的被拘押者报告称其见到 7 具囚犯的尸体。3 名妇女表示，一名曾一直与她们联系的女性被拘押者的婴儿在拘押期间死亡。8 名被拘者报告他们遭到守卫殴打，并目睹了守卫他人，两名被拘押者表示，守卫曾施以电击作为惩罚。

---

<sup>1</sup> 《沙特阿拉伯：良心犯阿卜杜拉·哈密德于羁押期间身亡》（新闻稿，4 月 24 日）

<sup>2</sup> 《沙特阿拉伯：压制异见——沙特阿拉伯特别刑事法院的政治化审判》（MDE 23/1633/2020）

<sup>3</sup> 《沙特阿拉伯：对年轻人死刑判决的复审是早该向正义迈出的一步》（新闻稿，8 月 27 日）

<sup>4</sup> 《沙特阿拉伯：“这比新冠还糟”：埃塞俄比亚人在沙特监狱中被遗弃和虐待》（MDE 23/3125/2020）

# 台湾

## 台湾

国家元首：蔡英文

政府首长：苏贞昌（于 1 月接替赖清德）

政府采取了多项控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其中一些对隐私权构成了威胁。《监狱行刑法》修正案未能回应涉及社会心理或智力残疾的死刑权利的问题。8 月，国家人权委员会成立。10 月，国际审查委员会在审查台湾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情况前夕，收到了各个国际组织的报告。

## 大规模监控

1 月，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预防新冠疫情传播的措施，其中一些对隐私权构成了威胁。政府建立了大规模监控的数字框架，并将旅行和健保记录等政府数据库连接起来，以进行跟踪和追踪。超过 35 个政府部门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持续监控人们的行动以及包括购买外科口罩在内的其他活动。政府很少提供有关其使用该平台的细节，也没有说明数据收集措施何时终止。<sup>1</sup>

## 死刑

1 月，《监狱行刑法》被修正，这导致了 7 月份《执行死刑规则》的修改。修改后的规则仍然允许对有社会心理残疾或智力残疾的人判处死刑。<sup>2</sup> 本年度，当局在废除死刑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并继续执行死刑。<sup>3</sup>

## 获得真相、正义和赔偿的权利

作为监察院（《宪法》规定的政府监督机构）一部分而成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于 8 月开始履职。该委员会由独立行事的成员组成，负责调查包括歧视在内的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申诉，起草和发布国家人权报告，并向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意见。<sup>4</sup>

##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只获得了有限的援助。<sup>5</sup> 逾 200 人在 6 月底国家安全法颁布后从香港抵达台湾寻求庇护。这凸显了台湾目前关于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其他需要国际保护（不驱回等原则）的人的法律框架有不足之处，人们亦再次呼吁通过《难民法》。

## 国际监督

6 月 29 日，政府宣布邀请国内和国际专家，审查其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sup>6</sup> 国际审查委员会预计于 2021 年 10 月 18 至 22 日云集一起，就两公约进行第 3 次审查。

---

<sup>1</sup> 《台湾：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内履行情况向国际审查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书：第三次报告》，（ASA 38/3212/2020）

<sup>2</sup> 《台湾：〈死刑执行规则〉修正 应采纳〈公政公约〉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书》（声明，7 月 20 日，只有中文）

- 
- 3 《台湾：蔡英文总统任内的第二起死刑处决》（声明，4月2日，只有中文）
  - 4 《台湾：第一届国家人权委员会上路》（媒体声明，6月19日，只有中文）
  - 5 《台湾：世界难民日记者会》（媒体声明，6月19日，只有中文）
  - 6 《台湾：国际特赦组织提交两公约影子报告》（新闻稿，2020年10月23日，中英文双语）

# 泰国

## 泰国

国家元首：**玛哈·哇集拉隆功** (Maha Vajiralongkorn)

政府首长：**巴育·占奥差** (Prayut Chan-O-Cha)

**当局镇压和平抗议者，拘押那些参与和平集会及批评政府、宪法和君主制的人权捍卫者、反对派政客及其他人士，并对他们提起刑事指控。曼谷及其他城市发生了一系列示威活动。官方控制新冠疫情的措施使难民被强迫遣返的风险更高。法院在涉及谋杀等案件中做出了死刑判决；一些死刑判决被王室赦免减为终身监禁。**

## 背景

2 月，宪法法院根据《政党组织法》裁定解散新的反对党未来前进党 (Future Forward party)，该党在 2019 年的选举中赢得 81 个席位，此举被普遍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sup>1</sup> 未来前进党被解散，引发了公众对于政府的批评，并呼吁进行宪法改革。当局宣布对该党领导人和其他行政人员提起刑事诉讼，其中 16 人被禁止在 10 年内参加竞选。

3 月，总理巴育发布了一项紧急状态令，授权政府机构执行具体行动以遏制新冠疫情的蔓延。政府还同时发布了一份禁令清单，其中包括对言论自由权施加一些模糊和过于宽泛的限制。

紧急状态令原定于 4 月 30 日到期，但政府将其延长到了 12 月底。在紧急状态令下，当局被赋予宽泛的权力来镇压异见并起诉那些领导及参与和平集会的学生和活动人士。10 月，当局宣布进入“严重”紧急状态，赋予警察更多权力，但其在随后一周撤销了该命令。11 月，政府召开议会特别会议，在探寻宪法改革之际，针对持续的抗议集会讨论跨党派解决方案。

## 强迫失踪

岗卡章国家公园的官员被控于 2014 年令环保活动人士“比利”弗拉池·爱琼克乔纶 (Pholachi “Billy” Rakchongcharoen) 强迫失踪。1 月，国家检察官以缺乏证据为由，撤销了针对这些官员的蓄意谋杀及非法拘禁指控。<sup>2</sup>

6 月，身份不明人士绑架了流亡柬埔寨的泰国博客作者万查勒·塞萨西 (Wanchalearm Satsaksit)。<sup>3</sup> 泰国当局未透露是否与柬埔寨政府合作调查他被强迫失踪一事，也未公布是否采取了任何措施来确定他的生死和下落。2016 至 2019 年间，至少还有另外 8 名曾在邻国寻求流亡的泰国活动人士被绑架或失踪。

## 酷刑和其他虐待

3 月，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了指挥人员对应征入伍的士兵实施的酷刑和其他虐待模式，包括性暴力在内。<sup>4</sup> 据悉，军方指挥机构没有对这些指控展开调查。

9 月，国务委员会 (Council of State) 完成了对将酷刑和强迫失踪定为犯罪的最新立法审查。该法案未被内阁提交议会讨论。

被拘押在北大年 (Pattani)、也拉 (Yala) 和那拉提瓦 (Narathiwat) 这 3 个戒严法和紧急状态令仍然生效的南部省份的人报告称，在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持续不断下，发生了涉及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情况。

## 镇压异议

7 月，学生在首都曼谷和全国各地领导抗议活动，要求总理辞职、修改宪法，并改革君主制，使其受到法律、政治和财政监督。政府的反应是执行限制性法律，而且利用紧急状态令所赋予的广泛权力对和平集会施加不当限制。

10 月，政府宣布采取额外的紧急措施，以解决所谓的“非法公共集会”和据称抗议者阻挠皇家车队的问题。约 220 名包括儿童在内的抗议活动参与者遭到了拘押或面临刑事诉讼，包括有关煽动叛乱、冒犯君主、电脑犯罪和违反紧急措施的指控。<sup>5</sup> 5 名活动人士因“意图伤害皇后”被控违反《刑法典》第 110 条而面临无期徒刑；他们仍然处于保释状态。

示威活动的绝大部分是和平进行，但也有警察过度使用不必要的武力驱散示威者的情况。10 月和 11 月，警察使用了掺有化学刺激物的水炮，并向和平抗议者投掷催泪弹。

参加示威的儿童报告称，他们受到学校的威胁，要开除其学籍，而且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对他们施加其他形式的压力和骚扰，目的是阻止他们参加抗议活动。其中一些人报告称，学校当局殴打他们，没收他们的物品，并要求参加他们与当局的会面。

## 言论自由

当局和公司以涉嫌网络诽谤为由对 14 名人权捍卫者及网络评论员提起了多年的刑事诉讼后，法院在年初于 4 起不同的案件中宣布他们无罪。<sup>6</sup> 法院确认，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涉嫌劳工侵权或政治评论的帖子是出于公共利益的合法批评。

当局继续根据《电脑犯罪法》（Computer Crime Act）中措辞宽泛而模糊的条款，对在网上发表意见的数十人提起指控。<sup>7</sup> 其中一名艺术家因发布关于机场筛查新冠的脸书（Facebook）帖子而遭当局打压，而一名社交媒体用户被针对则是与王室车队的推文有关。

8 月，脸书宣布，已遵从当局的要求，限制用户对反君主制脸书群组“保皇党市场（Royalist Marketplace）”的访问，尽管其认为该命令“违反了国际人权法”。<sup>8</sup> 当局还试图审查媒体，包括请求法院批准关闭 5 家报道和平示威活动的网络媒体。

## 人权捍卫者

7 月，民事法院授予 700 余个柬埔寨家庭起诉泰国糖业公司两仪（Mitr Phol）一案集体诉讼资格，这些家庭在 2008 至 2009 年被强行驱逐出他们位于柬埔寨西北部的家园。<sup>9</sup>

社区人权团体报告称，他们因策划或参加和平抗议活动而受到当局的骚扰和刑事诉讼威胁。

尽管通过了《关于企业和人权的国家行动计划》（National Action Plan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政府却未能阻止公司和其他商业实体为压制人权捍卫者而提起反对公众参与的战略诉讼（Strategic Litigation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在法院驳回了其中一些针对人权捍卫者提出的反对公众参与的战略诉讼时，公司又提起了新的诉讼。

## 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

当局推迟了 6 月生效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国家甄别机制（National Screening Mechanism）的实施。

移民和难民被无限期地任意拘押，且拘留设施人满为患，这增加了他们感染新冠的风险。50 名维吾尔男子仍被无限期地羁押在条件恶劣的移民拘留设施中，等待土耳其或中国证明其国籍。

年内，载有数百名罗兴亚难民的船只滞留在海上数月，缺乏食物、水和医疗卫生服务。泰国当局阻止其登陆，并据报将船只推回海上，使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

---

<sup>1</sup> 《泰国：当局须撤销解散反对党未来前进党的决定》（新闻报道，2 月 21 日）

<sup>2</sup> 《泰国：比利失踪六年后，当局必须为其伸张正义并保护其社区的权利》（ASA 39/2155/2020）

- 
- <sup>3</sup> 《柬埔寨：调查失踪泰国异议人士下落》（新闻报道，6月5日）
  - <sup>4</sup> 《“我们对他们而言只是玩具”：应征入伍者在泰国军中受到的身体、精神和性虐待》（ASA 39/1995/2020）
  - <sup>5</sup> 《泰国：撤销不公指控，释放和平抗议者》（新闻报道，10月24日）
  - <sup>6</sup> 《反对针对揭露劳工侵权行为的人权捍卫者提出的诽谤指控》（ASA 39/1846/2020）
  - <sup>7</sup> 《“它们无时不在监视：泰国限制网络言论自由》（ASA 39/2157/2020）
  - <sup>8</sup> 《泰国：脸书屈服于滥用审查权的要求》（新闻报道，8月25日）
  - <sup>9</sup> 辉迈及其他人诉两仪有限责任公司（Hoy Mai & Others vs. Mitr Phol Co. Ltd）一案的法院之友（ASA 39/2753/2020）

# 美利坚合众国

## 美利坚合众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国内外的人权记录劣迹斑斑。因应新冠疫情、2020年大选争论，加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引发种族主义反弹，美国各地涌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在应对成千上万的反制度性种族主义和反警察暴力的公众示威活动时，执法当局频繁对抗议者和人权捍卫者过度使用武力，亦未能控制住针对主要是和平集会的暴力抗议活动。美国政府还试图削弱对妇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同志）、战争罪受害者等的国际人权保护。当局还利用新冠疫情把目标锁定在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进一步侵犯其权利。乔·拜登（Joe Biden）被宣告为11月总统大选的胜出者。

## 背景

尽管选举人团确认乔·拜登赢得11月的总统选举，特朗普总统仍然质疑有关结果，多次在没有事实根据下声称选举舞弊。持续的指控引发了支持特朗普的抗议活动，让人关注到1月是否会出现和平的权力交接。

## 歧视

新冠疫情加剧了美国长期存在的的不平等现象。政府应对疫情不足且程度不一，以致许多人因其种族、社会经济状况和其他特征而承受不成比例的歧视性影响。体制上的差异决定了谁在前线工作，谁有就业和经济保障，谁能获得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sup>1</sup>

由于监狱和拘押场所的卫生环境欠佳，被羁押者面临的风险尤其大，原因是他们无法充分保持大家之间的距离，而且，这些设施成为了感染的高发场所，导致他们无法获得适足的卫生用品。此外，种族歧视性的政治言论和暴力或会增加仇恨犯罪的数量。

## 健康权

美国政府未能在疫情期间提供充分保护，让卫生保健、执法、运输和其他从事“必要”行业的工作人员面临巨大挑战。由于个人防护装备短缺，医疗卫生和其他从事必要工种的人员常常不得不在没有充分保护和不安全的环境下工作。4月，全国护士联盟（National Nurses Union）在白宫前抗议卫生工作者缺乏个人防护装备，期间参与者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2020年3月至12月，2,900多名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在新冠疫情期间死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承认，现有的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了。

公共及私营部门的一些医疗卫生和其他从事必要工种的人员提及防护装备不足的问题后，还面临报复，包括遭受骚扰、纪律程序及被不公平解聘。

## 过度使用武力

至少1,000人据报被警察用火器杀害。有限的公开数据表明，黑人受到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影响格外严重。美国政府实施了一项计划，追踪每年此类死亡个案发生的数量，但此计划并未得到充分落实。在有管制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州中，没有一个的法律符合关于执法人员使用致命武力的国际法和国际标准。<sup>2</sup>

## 集会自由

美国各地的执法部门对抗议黑人遭非法杀害和要求警察改革的民众实施了普遍且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到，仅在 5 月 26 日至 6 月 5 日期间，40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就发生了 125 起警察针对抗议者的非法暴力事件。<sup>3</sup> 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又发生了数千起抗议活动。

市、县、州和联邦各级执法人员都实施了侵犯人权行为，包括联邦政府在一些城市部署的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这些人员的暴力行为包括使用警棍或其他装备殴打人们，滥用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以及不适当地无差别发射“低致命性”弹药。

在多处事件中，据说包括抗议活动组织者、媒体代表、法律观察员和街头医护人员在内的人权捍卫者因记录和纠正执法机构的侵犯人权行为，而成为执法人员使用化学刺激物及动能冲击弹的攻击目标，并遭到了逮捕和拘押。

## 生命权和人身安全

政府一直未能保护个人免受持续的枪支暴力伤害，这侵犯了他们的生命权、人身安全及不受歧视的自由等人权。人们不受限制地获得枪支，加上美国缺乏全面的枪支安全法（包括没有对枪支的获取、持有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管制），而且没有对枪支暴力的预防和干预方案投入资源，使得这种暴力持续存在。

在 2018 年（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约有 39,740 人死于枪伤，估计还有数万人遭受枪伤但幸存下来。在新冠疫情期间，枪支销售和枪击事件增加，但美国政府未能履行其义务，防止枪支暴力致死，而这一本可通过一系列的紧急措施来实现，例如不再将枪支售卖商店列入生活必需商业。

截至 2020 年，美国有 34 个州制定了扩张性的“就地防卫法”（Stand Your Ground）和“城堡法”（Castle Doctrine）法。这两项法律都规定，个人在家中或感觉受到威胁时，可以使用致命武力自卫。这些法律似乎加剧了枪支暴力和本可避免的死亡或重伤风险，因而侵犯了生命权。

随着反对黑人被杀的抗议者走上美国各城市的街头，在允许公开携带枪支的州发生了武装平民与抗议者交火的事件，造成至少 4 人死亡。

## 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的权利

尽管国内的移民拘留场所爆发了严重的疫情，但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却拒绝释放数以万计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逾 8,000 人在拘押期间感染了新冠肺炎。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违反了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指引，没有提供足够的肥皂和消毒液，也没有实行保持人身距离的措施，并继续不必要地将成千上万的人转移到不同的移民拘留设施。<sup>4</sup> 这当中包括约 100 个被关押在拘留中心的家庭，鉴于新冠确诊病例和保护措施不足，一名美国联邦法院法官认为他们情况危急。5 月，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询问父母是否同意在不释放整个家庭的情况下只将其孩子释放，而父母仍被拘押。

同时，美国政府利用新冠疫情危机终止了对美墨边境的寻求庇护者的所有处理程序，并拒绝为那些以非正规的方式进入美国的人办理庇护程序。相反，当局在 3 月至 11 月期间非法拘押和“驱逐”了逾 33 万名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当中包括约 13,000 名无人陪伴的儿童，此举并未考虑其有受保护的需或需其被强迫遣返回原籍国后可能面临被迫害、死亡、受到酷刑或其他虐待的风险。<sup>5</sup> 在数百起有记录的案例中，这些被遣返者由于当局的疏忽而在美国被拘押期间感染了新冠肺炎，并促成了疫情在整个美洲地区的爆发。

美国的难民安置人数进一步骤减。2020 财政年度的难民接收人数被定为 18,000 人，是该方案有史以来的最低数字，而 2020 年实际安置的难民人数约为该数字的一半。

## 人权捍卫者

2018 及 2019 年,当局没有采取任何问责措施纠正法律被滥用来骚扰移民人权捍卫者的行为。2018 年,联邦上诉法院认定一项被政府用来对移民人权捍卫者实施非法监控的关键刑事法律违宪。但美国最高法院在 6 月却撤销了以上裁决,并发回上诉法院重新审议。

## 妇女权利

原住民妇女受到强奸和性暴力的比例持续偏高,并在遭受强奸后得不到基本的护理。2019 年,特朗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组建失踪及被谋杀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问题工作组 (Task Force on Missing and Murdered American Indians and Alaska Natives)。截至 12 月,工作组开设了 7 个悬案办公室以调查案件,但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收集数据或与部落政府进行充分协调,确切的受害者人数仍不清楚。

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封锁措施加剧了全国各地的家庭暴力和亲密伴侣暴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报告的事件或伤害的严重性增加。

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被迫与对其施暴者共同隔离在家中,而枪支购买的数量急剧上升。随着施暴者将更多不安全的枪支放置在家中,儿童和家庭暴力幸存者遭受枪支暴力的风险有所增加。

6

##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 (同志) 的权利

根据 2020 年发布的官方数据,基于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仇恨犯罪数字在 2019 年连续第 5 年保持高位。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妇女尤其成为暴力仇恨犯罪和杀戮的目标。

政府继续试图通过政策和法院取消在教育、军事、就业和联邦政府其他领域禁止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的保护。

## 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联邦和各州政府加大力度,意将堕胎规定为犯罪并限制人们获得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从而削弱性权利和生殖权利。<sup>7</sup> 政府还试图修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发展政策,不再在国际层面支持对性权利和生殖权利的保护。

## 酷刑和其他虐待

2001 至 2009 年期间,数十名被拘者被关押在一个由中央情报局运作的秘密拘留设施中,在此期间,他们遭受了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虐待等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但十年来,没有任何涉嫌刑事责任的人因为这些罪行被绳之以法。针对这些罪行进行的调查有限并已经结束,没有任何人受到指控。

## 死刑

3 月,科罗拉多州成为美国第 22 个废除死刑的州。

6 人被证明无罪不再是死囚,使 1977 年以来获证明无辜的总人数增加到 173 人。柯蒂斯·弗劳尔斯 (Curtis Flowers) 是获释者之一,他经历了 6 次审判,在密西西比州的死囚牢房里待了 23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2019 年 6 月的判决中认定,地区检察官在 2010 年的第 6 次审判中故意将非洲裔美国人排除在陪审团之外,这侵犯了柯蒂斯·弗劳尔斯的宪法权利,该州于 9 月撤销了所有针对他的指控。

联邦重启暂停 17 年之久的处决,在 7 月至 12 月期间执行了 10 次死刑。特朗普政府热衷于执行死刑,表明其政府蔑视国际法和国际标准建立的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和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在上诉待决期间执行死刑和禁止对精神 (社会心理) 残障人士执行死刑。

联邦政府在 2020 年执行的死刑数量是 1977 至 2019 年总和的三倍多。不过，州执行死刑的速度放缓，其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自 1977 年美国根据修订后的法规恢复司法处决以来，共有 1,529 人被执行死刑。

## 任意拘押

美国军方将 40 名男子任意和无限期地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的拘留设施中，这违反了国际法。自 2017 年 1 月以来，只有一人被转移出该设施。5 名至少从 2016 年起被批准从关塔那摩转移的囚犯在 2020 年底仍被关押于此，并且，特朗普政府废除了早先为安排他们转移而设立的制度。

在这 40 名人中，没有一人得到适当的医疗照护，那些被美国特工实施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而幸存下来的人也没有得到适当的康复服务。其中 7 人面临军事委员会的指控，这违反了国际法及国际标准，并且，若被定罪，他们可能面临死刑。在不符合公正审判国际标准的诉讼程序后适用的这些死刑案件构成任意剥夺生命。被控犯有与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相关罪行的人的审判原定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开始，但在 2020 年由于所有案件的审前听证会都被暂停而推迟。

## 非法杀害平民

美国以破绽百出的“全球战争”理论为依据，多次在世界各国使用武装无人机等致命武力，这违反了其在国际人权法和适用的国际人道法下承担的义务。非政府组织、联合国专家和新闻媒体记录了在武装冲突活跃的地区内外，这种袭击如何任意剥夺了平民等受保护个人的生命权，并可能导致他们被非法杀戮和伤害，在某些情况下构成了战争罪。

美国政府在致命行动中削弱对平民的保护，增加了平民遭非法杀害的可能性，妨害了对袭击合法性的评估，亦阻碍了问责和遭受非法杀戮及伤害的受害平民获得正义及有效补救的机会。<sup>8</sup>

尽管联合国人权专家和其他人士呼吁美国说明其在境外使用致命武力时所适用的法律和政策标准，但该国政府依然缺乏透明度，也不愿提供信息。

## 国际人权机制和条约

11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美国的人权记录进行了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

自 2018 年 1 月以来，美国政府便未对特别程序的来文做出答复，也未接受其就进行正式访问做出邀请的请求。<sup>9</sup>

在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调查 2003 年 5 月 1 日以来在阿富汗境内犯下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危害人类罪行为后，特朗普政府于 6 月 11 日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授权冻结某些国际刑事法院官员的资产和禁止其家人入境。此举削弱了针对美国平民和军事官员在阿富汗武装冲突中可能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纠正措施，而美国当局未对这些罪行进行调查、起诉或惩罚。

7 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名为“天赋权利委员会”（Commission on Unalienable Rights）的咨询小组的报告。该报告似乎单方面重新定义了人权的含义，拒绝接受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人权机构的解释权威，并通过重新评估对保护妇女、同志及其他人免受歧视的措施而破坏了人权框架。<sup>10</sup>

7 月，美国政府在竭力遏制和应对数百万新冠感染的同时，启动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并将于 2021 年 7 月生效。特朗普总统任下，美国还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

<sup>1</sup> 《就呼吁建立公平问题工作组致各州长的信》（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公开信，5 月 6 日）

- 
- <sup>2</sup> 《美国：世界密切注视：美国警察大规模侵犯“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抗议者的权利》（AMR 51/2807/2020）
  - <sup>3</sup> 《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警察针对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的广泛暴力》（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于6月发布的地图）
  - <sup>4</sup> 《美国：“我们正在漂流，即将下沉”：美国移民拘留所的新冠灾难迫在眉睫》（AMR 51/2095/2020）
  - <sup>5</sup> 《关于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被驱逐出境和勒令离境的解释说明》（说明，5月）
  - <sup>6</sup> 《新冠疫情及枪支暴力问题：疫情与美国枪支暴力危机的十大交集》（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文章，5月）
  - <sup>7</sup> 《美国：就美国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提交的关于生殖健康、权利和正义的联合意见书》（联合意见书，6月）
  - <sup>8</sup> 《美国：国防部在新的报告中少计平民伤亡人数》（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文章，5月6日）
  - <sup>9</sup> 《美国：人权义务的倒退：国际特赦组织就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提交的意见书，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三十六届会议，2020年11月》（2020年8月更新）（AMR 51/1407/2019）
  - <sup>10</sup> 《美国：国务院错漏百出的“天赋权利”报告削弱了国际法》（新闻稿，7月16日）

# 越南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国家元首：阮富仲（Nguyễn Phú Trọng）

政府首长：阮春福（Nguyễn Xuân Phúc）

人权捍卫者受到的任意拘捕和起诉大大增加，记录在案的良心犯人数创下新高。在网上表达自己意见的人尤其成为攻击的目标。民主活动人士、独立记者、作家和出版商面临持续不断的骚扰、人身攻击、任意起诉，并在被警方羁押期间受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当局做出了死刑判决，并执行了死刑。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仍然是持续而广泛的问题。越南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赢得赞誉，有效遏制了病毒的传播。然而，当局对散布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处以惩罚，却往往构成了对言论自由权的任意限制。

## 背景

在 2021 年 1 月的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召开前夕，由于敌对政客和越共内部的派系权力争夺，政府对所有形式的异见发起了大规模的镇压。越南政府于 6 月批准了《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U-Viet Nam Free Trade Agreement），其中包含了遵守国际人权和劳工标准的义务。

## 言论自由

当局对言论自由实施了广泛的打压，特别是针对那些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个人。当局对网络言论的审查大大加强，此外，在网上和线下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遭任意逮捕、拘留和起诉的情况也显著增加。记者和作家也成为了打压的目标，政府对自由出版社（Liberal Publishing House）和越南独立记者协会（Viet Nam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Association）展开一连串拘捕和指控。自由出版社的两名成员在胡志明市被拘留期间受到警察的酷刑，该出版社是一家当地独立出版商，出售被政府认为是敏感的书籍。<sup>1</sup>

4 月，脸书（Facebook）宣布决定更严格地遵守政府的要求，审查自身平台所谓“反国家”的内容，但这样做相当于对合法的言论实施审查，违反了国际人权法。<sup>2</sup> 据报，当局用降低平台流量向脸书施压后，该公司才作出这一决定。

人权捍卫者和其他活动人士对脸书和 YouTube 在当局的要求下限制内容发布表示震惊，包括对敏感内容广泛进行的地域屏蔽（geo-blocking）、个人资料屏蔽和暂停账户等。这些措施标志着该国的言论自由空间严重紧缩。<sup>3</sup>

2 月 3 日，当局出台了对违反邮政、电信、无线电频率、信息技术和电子交易条例实施行政处罚的第 15/2020/ND-CP 号法令（“第 15 号法令”），进一步加强了严重损害言论自由权的法律框架。第 15 号法令规定了一系列针对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行政违法行为，并包含一系列威胁言论自由和信息获取渠道的严厉处罚。违反该法令的科技公司可被吊销营业执照，期限最长可达两年。第 15 号令还包含对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或分享“假消息”的用户实施的处罚，该处罚可施加于任何的民事和刑事处罚之外。

受政府支持的“网络部队”和“舆论制造者”在网上以政府异议人士为目标，对他们进行谩骂、骚扰、恶意攻击和大规模的举报，这往往导致人权捍卫者的账户和内容受到限制。人权捍卫者还因其网上活动，面临着人身攻击及其他形式的线下威胁和暴力。

## 良心犯

截至 12 月，越南至少有 173 名已知的良心犯被监禁，这是国际特赦组织自 1996 年开始公布数字以来的最高记录。其中 72 人因在网上发表意见而被羁押，这一数字较往年显著上升。在今年新收押的 30 名良心犯中，有 24 人（80%）是因网络言论被羁押。大多数人是根据《刑法》第 331 条或 117 条被拘押的，前者禁止“滥用民主自由侵犯国家利益”，最高刑罚为有期徒刑 7 年，后者将“制造、储存或传播旨在反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信息、材料或物品”定为犯罪，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

监狱环境总体上仍然恶劣，良心犯尤其受到歧视、骚扰和虐待。家属报告了良心犯在拘押期间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的事件，这当中包括阮文和（Nguyen Van Hoa）、阮文夙（Nguyen Van Tuc）、黄张哥（Huynh Truong Ca）、阮日广（Nguyen Ngoc Anh）和黎庭良（Le Dinh Luong）。

## 死刑

年内，法院继续判处死刑，该国亦执行了处决。政府继续实行将死刑相关信息列为国家秘密的政策。有关被判处死刑之人的详细情况仍未公开，包括他们的性别、年龄、种族或被判处的罪行类型。12 月，越南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暂停使用死刑的决议投了弃权票。

## 妇女权利

针对妇女的暴力仍然是持续而广泛的问题。政府和联合国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近三分之二的已婚妇女在一生中遭受过丈夫的暴力和控制行为，包括在身体、性、情感或经济上，此外，近三分之一的女性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报告遭受过此类虐待。家庭暴力或虐待的报告数量仍然极低，很少有妇女向当局或相关服务提供者寻求支持。

女性人权捍卫者继续面临骚扰、歧视和性别暴力。著名作家兼人权捍卫者范端庄（Phạm Doan Trang）于 10 月 6 日遭到任意拘捕，并被依据《刑法》第 117 条起诉。国际特赦组织认为她是良心犯。<sup>4</sup> 如果罪名成立，她可能会被判处长达 20 年的监禁。

##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政府统计数据显示，贫困家庭的比例从 2015 年的 9.88% 大幅下降到 2020 年的 2.75%，这反映了越来越多人实现了适足生活水准权的趋势。然而，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威胁着该国的可持续发展。

## 健康权

越南于 1 月 23 日报告了首例新冠病例，当局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控制病毒的传播。截至年底，该国报告了 1,465 起新冠病例及 35 起死亡个案。尽管部分控制疫情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保障了健康权，但当局也多次将压制言论自由权作为其应对措施的一部分。至少两名妇女，即：丁氏秋水（Dinh Thi Thu Thuy）和马冯玉富（Ma Phung Ngoc Phu）因发表对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看法而被任意拘捕和起诉，另有数百人因在社交媒体上就疫情应对措施发表意见而被罚款。

---

<sup>1</sup> 《越南：独立书商遭警察实施酷刑》（ASA 41/2325/2020）

<sup>2</sup> 《越南：脸书须停止与政府沆瀣一气》（新闻报道，4 月 22 日）

<sup>3</sup> 《越南：让我们呼吸！越南网络言论审查和入罪化》（ASA 41/3243/2020）

<sup>4</sup> 《越南：人权捍卫者被捕，面临遭受酷刑的严重风险》（新闻报道，10 月 7 日）